



红旗

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八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 认真看书学习 掌握理论武器**.....池 恒 (5)
- 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齐 新 (8)
-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翟 平 (13)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罗思鼎 (16)
- 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李 群 (27)
-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陈 今 (33)
-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钟 达 (40)
- 韬晦之计和林彪的复辟阴谋**.....师 平 (46)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沈 思 (49)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党支部 (57)

批林批孔 促进战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六连党支部 (61)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65)

发扬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 (70)

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找油找气
.....中国共产党大港油田委员会 (74)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 年
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 (82)

学大寨 讲路线
——湖北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的调查报告 (87)

路线搞对头 生产争上游
——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的调查报告 (91)

☆ 八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
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
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
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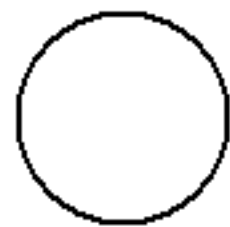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思想评论

认真看书学习 掌握理论武器

池 恒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奋起扫除孔孟之道的垃圾和污秽，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形成了一股具有强大威力的革命洪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蓬勃发展。

怎样才能使群众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呢？许多先进单位的经验表明，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在运动中始终抓紧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同时也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进行一次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清除它的思想影响，总是要同时开展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全党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批林批孔也是如此。为了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孔孟之道；为了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吸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现状，分析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关的各种重大问题。批判尊儒反法观点，正确地评价不同历史时期法家在历史上的



进步作用和局限性，深入地批判不同历史时期儒家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和欺骗性，也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就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击中要害。这是广大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一条重要经验。例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三字经》等反动小册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看，这些书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忠臣”和“孝子”，即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而编写的，不是专门写给劳动人民看的通俗性的大众读物。在旧社会，反动统治者根本不允许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读书呢？正因为如此，我们首要的是批判这些书所宣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认识它的反动本质，同它划清思想界限。正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思想都毒害劳动人民一样，《三字经》之类也毒害人民，我们今天对它进行批判，就是为了清除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对谚语也要进行阶级分析：有一些完全是腐朽反动的，它们散布孔孟之道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加以批判；有一些则是劳动人民斗争经验的总结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有少数，我们后来使用时赋予了新的涵义。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看清楚哪些必须批，哪些不能批，哪些要区别它们在不同情况下运用时的不同涵义。我们批判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认清它们反动的阶级实质，并通过这样的批判，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因此必须从阶级实质上、从路线上去着眼，而不要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要批判就要讲道理。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宣布孔孟之道是错误的、反动的，比较容易做到，而要真正从理论上把它批倒批透，就必须用气力，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讲明道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法家的代表人物批判孔孟之道时，都从他们各自的阶级地位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讲了很多道理，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原因就是他们受



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我们今天能够彻底批倒孔孟之道，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外，最主要的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运用这个科学的武器，我们的批判，就可以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准确得多，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能够对历史现象，包括儒法斗争，得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批林批孔运动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广大工农兵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思想水平和批判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时，革命的大批判也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联系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可以更牢固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了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为了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历次路线斗争的论述。坚持这样做，就能不断促进理论同实践的结合。革命大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我们应当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广大群众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使广大群众的学习也能不断向前发展。群众性的学习和批判，对领导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努力赶上，力争比群众更多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阅读和研究报刊上的主要文章，并尽可能多学一些历史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运动，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先进经验。

今天，孔孟之道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摧毁了。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应部分，正在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看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借孔孟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出修正主义。因此，反修防修、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

齐 新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使我们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以及群众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提高了人们的路线觉悟，使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进一步得到发展。全国热气腾腾，形势一片大好。当前，我们面临着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搞好革命团结，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革命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努力增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搞好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内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深入和广泛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鼓吹、提倡和强制推行，孔孟之道这种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旧中国形成了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并且影响到现在，影响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反革命的策略，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孔孟之道。批林必须批孔。我们要彻底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上层建筑，在斗争中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做出极



大的努力。这样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我们依靠工农兵这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还要注意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人，推动他们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批林批孔大军。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更大胜利。

孔老二和林彪的路线，都是倒退、复辟、搞分裂的路线。反动的儒家学派，从没落阶级的利益出发，向来都是搞投降、卖国和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林彪反党集团效法孔老二，尊儒反法，咒骂秦始皇，在他们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明目张胆地叫嚣要分裂我们的党，分裂我们的国家，实行反革命的割据，妄图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林彪和孔老二的这条反革命的分裂路线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总根源。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批判他们的这条分裂路线和罪行，进一步加强我们党和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斗争本身，就要求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还要看到，批林批孔这场斗争，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我们搞批林批孔，就是要挖掉他们赖以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使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难以得逞，这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和破坏。阶级敌人为了实现其反对革命的目的，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破坏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包括用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等卑鄙伎俩进行阴谋活动和分裂活动。因此，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必须深刻地理解搞好革命团结对于搞好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在批林批孔中增强革命团结，克服那些妨碍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的思想和行动，做搞好革命团结的促进派。对于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的反动言行，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

经验表明，搞好革命团结的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我们所讲的团结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团结，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如果没有领导“一班人”的团结一致，就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去战斗。因此，各级领导班子能否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对于搞好党内外团结关系极大。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站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敢于积极引导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抓革命、促生产。这样做，就坚持了无产阶级党性，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的团结就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就抓住了搞好革命团结的根本。所以，我们要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首先就要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地参加批林批孔斗争。许多事实都说明，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和单位，广大干部就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增强，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地方的少数领导干部怕这怕那，不敢上阵，不能大胆地领导运动，同群众一起战斗。他们中间，有的人不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缺乏自觉革命的精神，不但影响了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也影响了群众之间的团结。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同志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还不够端正，他们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对批林批孔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才能解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必然引出的革命运动，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实践。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革命运动要进行多次。不这样做，就不能彻底粉碎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就不能对付帝、修、反的进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是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伟大号召，奋起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同时联系实际，批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了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这正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表现，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现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能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或者回避矛盾，放弃领导，或者不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落实党的政策，结果使矛盾激化起来，损害革命团结。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务必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正确。

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是促进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群众中，对于同一个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存有某些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而这些意见和分歧是不难解决的。但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再加上某些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使得那些本来不难解决的问题复杂化起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不能不给以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和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他们的重要经验是，引导群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罪行，使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人民群众的死敌，人民群众同林彪反党集团是势不两立的。认识到，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团结对敌，而没有半条理由搞分裂。要对敌狠，对己和，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反党集团身上。只要分清了敌我，分清了大是大非，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要让群众在斗争实践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



广大群众都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党依靠的基本力量。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作为领导干部，对于群众中的意见分歧，应当本着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出以公心，正确对待。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发扬和支持，凡是不正确的意见就要指出，并帮助他们自己认识和改正。要引导他们“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对于在批林批孔当中搞好革命团结，也是完全适用的。

有的人把这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成是“路线是非不清”，是“和稀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讲路线是非，首先要分清敌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当前最大的路线是非。批林批孔，首先就是为了分清这个路线是非。当然，群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是一种是非。但是，分清这种是非，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就是要斗私批修，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自觉地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和战胜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无产阶级的品质，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通过这种方法，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怎么能说是“和稀泥”呢？那些离开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纠缠人民内部的一些具体问题不放，反对在同志之间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硬是要论高低、争输赢的做法，势必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根本上混淆是非，走偏方向。这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背党的思想和作风，非常不利于革命团结的。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当珍惜和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做促进革命团结的模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为搞好批林批孔，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作出更大的贡献。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

翟平



正当广大工农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个说法：“儒法斗争是狗咬狗。”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从他们产生之日起，就由于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而势不两立。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专门制造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舆论；以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大喊大叫。这两家之间，围绕着“礼治”还是“法治”、“复井田”还是“废井田”、“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尊天命”还是“反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法家坚持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是进步的。儒家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步变革，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反动的。只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路线同坚持和发展封建制的路线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两个阶级的生死存亡。既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怎么可以说成是“狗咬狗”呢？

事实上，儒法两家都各自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诛少正卯，射杀吴起，车裂商鞅，其罪名都是因为闹革新，搞变法。这是反动势力迫害进步势力的反革命事件，而不是什么“狗咬狗”。同样，法家的态度也很鲜明。韩非明确指出：“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他强调儒法两家的斗争就象冰块和炭火不可共处，冬天和夏天不可同时一样，没有半



点调和的余地。韩非就怀着对奴隶主贵族及其儒家的“不可两存之仇”（《韩非子·孤愤》），英勇战斗了一生。

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是不是“狗咬狗”呢？也不是。儒法斗争延续到封建社会，比起春秋战国有着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阶级基础，但仍然是对立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孟之道被腐朽的地主阶级捧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之后，批判儒家思想往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儒家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的利益，顽固地宣扬孔学，对内鼓吹守旧和分裂，对外一般都搞民族投降卖国主义；法家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进行了对孔学的批判，代表着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宣扬革新和统一，在侵略者面前一般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柳宗元的《封建论》同李贽对孔学的批判，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同儒家是两条路线，能说这是“狗咬狗”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历史上站在反孔斗争前列的也是劳动人民。从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到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连绵二千多年、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反动统治势力和儒家路线，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历代法家的革新、统一的路线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行。综观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史，是一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儒法斗争说成是“狗咬狗”，就必然歪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时，它还抹煞我们今天对尊儒反法思潮批判的深刻意义，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尊孔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尊孔派，他尊孔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反法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党同林彪一伙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背叛了十月革命的苏修新沙皇，蜷伏于海岛的蒋介石，他们和林彪一样地尊孔反法。他们要尊孔，我们要批孔，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他们恶狠狠地咒骂法家，否定法家，并借此咒骂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分析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吸取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种斗争同样是不可调和的。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对法家进行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为了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引导人们向前看，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加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性的认识。如果对历史遗产不区别精华和糟粕，采取一律拒绝、一律否定的态度，那就是对“古为今用”方针的否定。

所谓儒法斗争是“狗咬狗”的说法，这本身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阶级敌人宣扬它是为了掩盖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借以浑水摸鱼；我们的同志也信这一套，那就一定认识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容易受骗上当。历史上有没有“狗咬狗”的现象呢？有的。那是在反动派、尊孔派内部的尔虞我诈。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对待当时民族矛盾的态度时，曾经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各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瓜分中国，它们之间，它们的走狗之间，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例如，当时的胡汉民与蒋介石这两个尊孔卖国派之间就形成一种对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正如《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内部各派系的勾心斗角那样，他们之间“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即使是这种真正“狗打架”的争斗，毛主席也指明“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用以对付主要的敌人。这种科学的阶级分析同用“狗咬狗”抹煞一切的论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澄清错误观念，警惕坏人的造谣和破坏，学会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好更深入！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罗 思 鼎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法家和儒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条战线大决战的时刻。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农民起义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研究、总结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包括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帮助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替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创造了条件。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摧毁了在关东六国还大量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①李白的诗，歌颂了秦始皇



统一中国的功绩和他的卓越政治才干。凭借着已经成熟的历史条件，在奴隶们反抗奴隶制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在经过商鞅变法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形势下，秦始皇坚定地实行法家路线，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敢作敢为，生气勃勃，成为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最杰出的代表。

秦始皇统一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曾满腔热忱地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②。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宣告了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当秦始皇死后，在短短三年内，秦王朝也随即灭亡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从来的尊儒反法派，从董仲舒、朱熹到林彪，从苏修到国民党反动派，无不抓住秦朝二世而亡，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秦朝迅速灭亡是秦始皇实行“暴政”的结果。秦朝的覆灭，是因为对儒家复辟派镇压得太多了吗？不！事实同这种断语相反，秦王朝的失败，正好不是因为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太多了，恰恰在于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是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秦始皇在粉碎吕不韦复辟集团的同年，鉴于吕不韦大批招募六国儒生入关，图谋复辟，曾下了逐客令。法家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因而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书》，这是正确的。对“客卿”应该作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③的政策，一概排斥。但“客卿”中也确实有象吕不韦、淳于越这样代表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坏人，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企图从内部瓦解秦朝的地主阶级专政。根据历史记载，所有知名的秦博士都是齐人和鲁人。齐鲁地区原是孔孟一派儒生根深蒂固的老窠。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深深地隐藏了下来。这就为秦王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在全国各地隐藏着大批心怀



不满的六国奴隶主复辟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章太炎指出：“六国公族，散处间巷之间”，“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④，他们企图复辟已经失去了的天堂，是必然的情势。秦始皇对公开的敌人是有一定警惕的，也采取了措施。如平毁六国军事要塞，征收全国的武器，多次巡视，到处刻石，宣传封建制的优越性，批判奴隶制的落后性。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由于这个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时间不长，对反复辟、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在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便滋长了太平麻痹观念，幻想从此“天下和平”⑤。秦始皇一死，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的恶果便迅速暴露，从埋藏在秦王朝内部二十多年的赵高，到躲藏在全国各地的六国旧贵族，一下子都从地底下涌了出来，而地主阶级却没有能够把这股复辟逆流打下去，秦王朝的灭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明朝张居正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秦始皇的继承者能够“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秦朝就不会这么快灭亡。他所说的，实质上是一个继续和加强秦始皇法家路线，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问题。而历史事实却相反，“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⑥，导致了秦王朝的倾覆。“六国余孽”是颠覆秦王朝的复辟势力，而所谓“奸宄内发”，就是指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官以进”⑦，在秦宫廷里当上了一名宦官，并成了公子胡亥的师傅。赵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赵高父母都因犯秦法而被判处重刑，他本人也差一点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被处死。“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⑧。后来秦始皇看他能说会道，又“复其官爵”⑨，给予重用。阴险的赵高从此改变策略，骗取信任，除继续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后又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这样，就使赵高有可能趁秦始皇病危，发动政变。

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但“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⑩。紧接着是赵高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他“留所赐扶苏玺书”，诱骗胡亥，



大谈“汤武杀其主”，“卫君杀其父”的历史，叫嚷卫君杀其父“孔子著之，不为不孝”^⑪，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同时又拉拢李斯，说什么“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⑫，使用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李斯就范。然后，赵高伪造诏令，逼死太子扶苏，逮捕并杀害坚持秦始皇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得逞了。汉代的樊哙曾用秦始皇的历史教训警告刘邦：“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⑬樊哙和赵高是同时代的人，他对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记忆犹新的。

赵高政变后，立刻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他改变秦始皇执行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政策^⑭，把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在赋税和徭役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企图使贫苦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秦自商鞅变法后，对公开的奴隶主反对派都是坚决镇压的，“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⑮。赵高篡权后，公然下令“更为法律”^⑯。反革命派上台，都要搞翻案，实行“大赦”。秦二世元年一月，“大赦罪人”^⑰，被秦始皇专政的罪犯纷纷跑出监狱，在咸阳街头弹冠相庆，而法家人士却遭了殃。儒家比法家杀人要厉害得多、残酷得多。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名反动儒生；赵高却千方百计“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阶级报复。继扶苏、蒙恬、蒙毅之后，秦始皇的子女二十多人先后被害，“相连坐者不可胜数”^⑱。接着，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被迫自杀，李斯也遭到被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同时，赵高对各郡县地方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赵高镇压了法家的反抗，任意“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公元前二〇七年，又杀了秦二世，并公开主张恢复六国的分封制。这个钻进秦朝内部的六国旧贵族代表，终于达到了“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⑲的罪恶阴谋。

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的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和动摇。李斯曾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来又参加制定了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政策，反对倒退，反对恢复分封制，是一个有过重要贡献的法家。但他也有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在赵高策动政变时，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以至容忍了赵高



的阴谋得逞。后来，李斯企图重新进行斗争，然而大势已去。李斯的致命伤是私心重，骨头软，他企图“委曲求全”，但向反动政变策划者讲“委曲”，是无法“求全”的。当然，李斯同赵高有本质的不同。李贽把李斯和赵高作了比较：“斯，龙也。高，蛆也。”^{②0}李斯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功大于过。而赵高则是韩非在《孤愤》篇中痛斥的那种“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是新兴地主阶级及法家的最危险敌人。从赵高的政变，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复辟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二

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教训是惨痛的。它证明秦王朝没有能够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革命农民的肩上。就在赵高发动政变，篡夺政权后九个月，陈胜领导的革命农民，在大泽乡上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宣告了赵高、胡亥反动统治的迅速灭亡。

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包括林彪及其死党，总是把陈胜、吴广起义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胡说什么“坑灰未冷山东乱”。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毫无疑问，秦王朝是要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是要把地主阶级的挥霍享受建筑在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基础上的。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无产阶级就立即开始了反抗一样，从封建制产生的第一天起，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斗争就出现了。这种阶级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在历史上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维护这个革命成果的斗争是很艰巨的。秦始皇采取的专政措施，当然有针对农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迫切的却是要解决防止奴隶制复辟的问题。特别是“焚书坑儒”，根本就不是对农民的镇压，而是对反动派的专政。那些被坑掉的儒，明明是奴隶主的代言人，也是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坑掉一批“不耕而食”的寄生虫，广大农民只会拍手称快，决不会加深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章太炎认为，“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章太炎还指出：“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②1}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对待法家尉缭的态度看，也并不象是儒家所攻击的那样不能听取正确意见。总之，把“焚书坑儒”说成



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一种违反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是反动派混淆是非的言论。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秦二世的时候，正是钻进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复辟派，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应当从阶级观点比较一下秦始皇和赵高两条不同的路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尚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在以后的石刻中，多次提到“黔首”，如二十八年的石刻中讲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②②}。三十一年下令实行“使黔首自实田”^{②③}的政策，鼓励发展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赵高掌权后，却对广大农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掠夺，造成“黔首振恐”^{②④}。应该指出，引起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赵高实行使“黔首振恐”的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

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废除了井田制，解放了奴隶的生产力，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的政策，使“秦民大说(悦)”^{②⑤}。当时“山东之民，无不西者”^{②⑥}，东方诸国的人民都想跑到秦国来。可见，人民群众是拥护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政策，“缓刑罚，薄赋敛”^{②⑦}，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贫苦农民即“间左”，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也就是说，一般是不随便“发间左”服役的。赵高上台后，改变了秦朝法家政策，“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②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在赋税方面，采取“头会箕敛”^{②⑨}，甚至大规模地“发间左”充戍卒，实质上也就是使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奴隶，这是革命农民所不能容忍的。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③⑩}，大规模地征发农民服徭役，把全国各地分散的农民都集中和组织起来了。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广大农民就能很快地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给赵高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赵高的倒行逆施，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赵高在沙丘发动的



政变，“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赵高也担心“皆不服，恐为变”。随着赵高、胡亥“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④，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反对奴隶制复辟。当时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也参加了推翻秦二世统治的斗争。陈胜起义时打出扶苏的旗帜，正是为了孤立和打击赵高。但当时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赵高政变，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防止奴隶主复辟的主力。对农民来说，一旦奴隶制复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奴隶制残余保存得越多，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在思想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是束缚奴隶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桎梏。因此，农民起义的斗争锋芒必然要指向奴隶主复辟势力，指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由关东六国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也参加了革命的洪流。如东阳陈婴起义，就有“异军苍头特起”^⑤，由奴隶组成的起义军成为一支重要“异军”。陈胜牺牲后，“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⑥，继续进行英勇斗争。

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失败了。除了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从内部的破坏。随着秦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为燎原烈火，潜伏在各地的奴隶主复辟派也蠢蠢欲动，起来“造反”。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反动儒生乘机混进了农民起义队伍。如秦王朝悬赏通缉的要犯陈余就“好儒术”^⑦。他和另一被通缉的要犯张耳都与孔子后代孔鲋“相善”^⑧。陈余隐姓埋名，四出游宦，“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⑨，积极从事复辟活动。混入陈胜起义军队伍后，张耳、陈余又派人去动员孔鲋，认为“天下之事已可见矣”，时机成熟了，“子宜速来”^⑩。于是，孔鲋等鲁诸儒抱着“礼器”也混了进来。大批反动儒生混入起义队伍，必然企图改变农民起义的路线，于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

孔丘的后代孔鲋公开要陈胜“法先王”，胡说：“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摆在施政方针的首位，要陈胜“诚法之”。陈胜当场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安能纯法之乎！”我是靠自己起来造反的，同周灭商不一样，怎么能完全去学呢？把孔鲋顶了回去。陈胜对孔孟之道是采取怀疑批判态度的，他说：“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陈胜手下将领武臣，在与孔鲋辩论时，也认为



孔学未必正确，“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⑳。可见，尊儒还是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

孔鲋等反动儒生的政治目的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张耳、陈余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行动是“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他们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主张“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遭到了陈胜的抵抗。张耳、陈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骗陈胜分兵“北略赵地”。陈胜对他们是有所警惕的，派“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率领三千农民军出发。后来武臣受张耳、陈余腐蚀，自称赵王。陈胜命令武臣向咸阳进军，张耳、陈余又反对，主张“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公开从农民起义队伍中分裂出去。在张耳、陈余的蛊惑下，武臣派韩广“略燕”，在燕国旧贵族支持下，韩广也割据称王^㉑。

六国奴隶主残余和割据势力纷纷“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㉒，实行复辟，这样就牵制和分割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如田儼是齐王田氏后代，他收罗“豪吏子弟”，自立为齐王，带兵进攻陈胜手下大将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儼因率兵东略定齐地”，然后就在齐鲁一带割地称王^㉓。当时，各地起来称王的都是韩、赵、魏、楚等国的贵族后裔。汉代的刘敬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㉔六国旧贵族虽然经过秦始皇的沉重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一旦时机成熟，又死灰复燃。他们是农民革命的死敌。

陈胜、吴广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㉕。在这期间，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起义的革命大扫除，地主阶级也第一次受到农民起义的强有力的冲击。秦统一后，六国旧贵族盘根错节，在地方上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起义还显示了农民革命反封建的巨大威力，使历代封建统治者提起这次起义就胆战心惊。



三

陈胜、吴广起义后，紧接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斗争的实质是继承还是推翻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项羽和刘邦，原来都属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农民起义斗争。陈胜、吴广牺牲后，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立楚国贵族后裔为楚王。后来，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则占领了关中和秦的首都咸阳。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并封刘邦为汉王。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战争，历史上就称为“楚汉相争”。

楚汉相争，从路线上看，是一场儒法斗争。刘邦平生“不好儒”^{④④}，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④⑤}。项羽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门信徒。刘邦平时“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④⑥}。同刘邦相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仁而敬人”^{④⑦}，很讲究儒家那套虚伪的礼节，但对劳动人民却极残酷，他将秦朝放下武器的二十余万士兵当作奴隶，“奴隶使之”，最后残暴地全部杀害^{④⑧}。项羽好“礼”，儒家之徒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下来了。他任人唯亲，“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④⑨}。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也决不是偶然巧合。项羽死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按照儒家的“礼义”，标榜为项羽“死节”，但不久“乃降”^{⑤⑩}。可见，项羽依靠的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刘邦原是个亭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另一些人是劳动者，如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以屠狗为业，灌婴是小商贩。项羽和刘邦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但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阶级基础是不同的。

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项羽则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了一条儒家的反动路线，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在项羽和刘邦进入秦国的首都咸阳时，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刘邦入关后，废除了赵高的严刑苛法，对杀死赵高、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取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项羽入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官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⑤⑪}。项羽挖秦始皇坟



墓，火烧阿房宫，大肆抢掠，完全是一种发泄六国旧贵族亡国之恨的阶级报复。公元前二〇七年，项羽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一下子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章邯等三人为王，“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⑤②}。刘邦列举项羽的十大罪状，痛斥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⑤③}，项羽恼羞成怒，但无言可对。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关键是这个集团的路线比项羽正确。同时也依靠了秦始皇时留下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从军事实力上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次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券。汉朝建立后，评肖何为第一功。大臣们也认为：“肖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肖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⑤④}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失道必然寡助，项羽转战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未尝败北，但政治路线错了，军事上仍旧要失败。垓下之战，四面楚歌，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但项羽临死时还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难怪司马迁要嘲笑他：“岂不谬哉！”^{⑤⑤}

在战胜项羽后，刘邦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汉承秦制”，刘邦基本上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⑤⑥}，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但在战争过程中，仍然还遗留了一批六国贵族残余势力，并形成了一批新贵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刘邦不得不同他们作暂时的妥协，对他们的代表人物封王封侯。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卢绾等。这就酿成了汉代初年汉王朝同以异姓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力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楚汉相争的继续。这些异姓王，对内实行分裂割据，保护工商业奴隶主残余势力，对外向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奴隶主贵族屈膝投降。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又封了一些同姓王，为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根子。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期过去了。从刘邦、吕后，中经文



帝、景帝，到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和中央集权，标志着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巩固了下来。它离开秦王朝统一中国又经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始终非常激烈。历史证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光有一代人的努力也还不行，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我们今天要巩固社会主义江山，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和项羽的倒行逆施的教训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即使反动派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短命的，暂时的。赵高政变，不到三年，很快就垮台了。项羽倒行逆施，也只能昙花一现。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在批林批孔中加强团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

- ① 《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第三首
- ②⑨ 《史纲评要·后秦纪》
- ③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史记·李斯列传》
- ④㉓ 《秦政记》
- ⑤⑫⑲⑳㉔㉕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⑥ 《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 ⑦⑱ 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一
- ⑧⑨ 《史记·蒙恬列传》
- ⑬ 《史记·樊哙传》
- ⑮ 《商君书·赏刑》
- ⑰ 《史记·六国年表》
- ⑲ 《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 ㉑ 《史记·商君列传》
- ㉓ 《商君书·徠民》

- ㉔⑳㉕㉖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 ㉗⑳㉘㉙ 《史记·项羽本纪》
- ㉚⑳ 《史记·陈涉世家》
- ㉛⑳㉜ 《孔丛子》
- ㉝ 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九》
- ㉞ 《史记·田儉列传》
- ㉟ 《史记·刘敬传》
- ㊱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㊲ 《史记·黥布列传》
- ㊳⑳㊴ 《史记·陈丞相世家》
- ㊵ 《汉书·高帝纪》
- ㊶ 《史记·淮阴侯列传》
- ㊷ 《史记·高祖本纪》
- ㊸ 《史记·肖相国世家》
- ㊹ 《史记·肖相国世家》



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 群

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所作的伟大贡献，正确评价法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批判儒家的阻碍、破坏作用，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很多农作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驯化选育而成的。远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就创造了先进的耕作制度——绿肥轮作制。我国有悠久而又系统的天文观测记录，战国时期就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从汉朝起就记载了新星、太阳黑子等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筑起了雄伟的万里长城，修建了至今受益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开掘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和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等伟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发明家、科学家。有在建筑、木工、器械各方面都有发明创造的鲁班，有设计赵州桥的石匠李春，有发明活字印刷的“布衣”毕升，有平



民天文数学家卫朴，有巧合龙门的治河工人高超，有纺织技术上的女革新家黄道婆等等。这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他们是科学技术的真正主人。

在劳动人民发展科学技术的伟大斗争中，儒法两家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

儒家代表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他们敌视革新，轻视生产，鄙视劳动人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把请学稼的樊迟斥责为“小人”。孟轲叫嚷：“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就是说，要对善于打仗的人处以极刑，对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人也处以重刑。在儒家的经典《礼记》上甚至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儒郑玄明确地注解，所谓作奇技奇器者，就是象古代鲁班这样的人。韩愈叫嚣说：“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发展生产有罪，创造发明该杀，这就是儒家的“礼教”！一方面要劳动人民供养他们这伙寄生虫，一方面又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这就是儒家的“王道”！

在儒家的反动思想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才能被扼杀，发明创造被湮没，科学技术的历史被颠倒。在儒家的历史书上，根本看不到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高超巧合龙门等记载。我国古代许多极有价值的科学典籍，由于受到儒家反动思想的鄙弃、摧残而失传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那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可是到了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东汉以后，除《内经》外，其余的都没有了。据《齐民要术》记载，秦汉时期重要的农书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多种，后来却没有一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儒家所代表的反动没落阶级的腐朽、寄生的本质，他们所推行的那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们所奉行的天命论的反动思想路线，决定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起消极的、破坏的作用。

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时是生气勃勃的革新者，他们主张革新、前进，重视耕战，因此在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秦汉之际，我国水利事业有几次大的进步，从秦代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到汉代的白渠，在工程技术上都有提高和发展。它们是我国古代水利发展史上几个光辉的里程碑。这些工程是劳动人民所



创造的，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宏伟壮观的工程都出现在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地说明了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促进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与自然作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积累了日益丰富的自然知识。这就使得法家思想家能够逐渐总结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且拿起自然科学这一武器，同儒家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

先秦法家代表荀况明确指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识到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有自己运动的规律。荀况研究了农业生产的经验，指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益，一岁而再获之”。并总结出“多粪肥田”、“桔耕伤稼”等农业科学规律。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是对孔孟之流所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东汉时期的王充，认真研究自然现象，分析了四季成因，指出：太阳离北极近，昼长夜短，就成了夏天；太阳离北极远，昼短夜长，就成了冬天。这就驳斥了董仲舒把四季说成是“上天”喜怒哀乐的谬论。王充根据实际观察推断：“雷者，火也”，批判了儒家认为打雷是天怒的胡说。唐代法家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他在《天说》《天对》等著作中，论述了宇宙是物质的，是无边无际的，是不断运动着的。北宋的革新家王安石明确指出：“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蚀、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他与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根本对立，提出“尚变者，天道也”，并认为“新故相除”是必然规律。这些法家代表都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他们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儒家反动的天命论和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作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而且推动人们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这样，就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思想上开辟了道路。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法家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唯心史观的圈子。然而他们坚持革新、前进，比较重视群众的生产实践，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



想。因此，历史上进步的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总结生产斗争经验和从事科学实践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法家那里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往往同法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特征常常象恩格斯所形容的那样：“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

北魏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继承了管仲、李悝、晁错、桑弘羊等法家人物的先进思想传统，批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丘之流。他能够作到“询之老成”，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他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上升为比较系统的农业科学理论。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他一生的科学实践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他注重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贾思勰和沈括，分别写出了《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重要的科学典籍。这些著作成为记载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一块块丰碑，至今仍然发出不可磨灭的光辉。

列宁曾经指出：“难怪有人早就说过，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始终同反儒斗争联系着的，可以说，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科学成就都是冲破了儒家反动思想的束缚才取得的。

东汉时代，儒家反动思想甚嚣尘上，谶纬迷信风靡一时。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敢于冒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痛斥谶纬之说“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他努力研制浑天仪和地动仪等科学仪器，观测天象，研究地震，在科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科学活动有力地打击了谶纬迷信。

南北朝时进步的科学家祖冲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根据自己观测的结果，创造了新的历法——大明历。他打破了传统观念，改革闰法，第一次在制历中考虑了岁差，使我国历法向前迈进一大步。但是朝廷宠臣戴法兴之流，站在儒家立场上，墨守成规，反对改革。戴法兴胡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有错也不能改”，“月亮运动的快慢，凡人测不出来”。祖冲之一一驳斥说：“明知古历有错，却要永远照搬，那就太荒唐了”，“月亮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不是什么神仙鬼怪搞的，是



可以测量、可以推算的”。戴法兴理屈词穷，给祖冲之安上“诬天背经”的罪名，妄图以此扼杀大明历。祖冲之无所畏惧地回答说：“空洞的咒骂吓不了人”，“你有根据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几经曲折，大明历终于在公元五一〇年（祖冲之死后十年）被正式采用。

儒家仇恨一切新生事物，反对一切先进的科学思想。当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传到我国后，清代腐儒阮元还固守“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的信条。他攻击哥白尼的学说是“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历史的事实证明，儒家顽固地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总是反对从自然本身的运动去说明自然，还要给进步科学家安上“离经叛道”等莫须有的罪名。

儒家不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赤裸裸的镇压和打击，而且竭力歪曲科学成果，想方设法地把它纳入反动天命论的教义，使科学成为儒学的附庸，实际上取消科学。例如，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数学成就的《九章算术》，被说成是周公所作以教天下的。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曲阜的孔继涵叫嚷“九数之作，非圣人孰能为之哉”，宣称《九章算术》“囊括后贤胥不能度越范围焉，犹六经之临百氏也”，不许人们逾越《九章算术》一步，阻碍数学向前发展。还有人用数学注释儒家经典，竟用等比级数去解释《仪礼》中的丧服经带法等，妄图把数学引入经学的死胡同。宋儒朱熹竭力给科学灌输神秘主义。法家沈括曾考察太行山地层中的螺蚌壳和卵石带，作出了海陆变迁的科学结论；而朱熹却歪曲这一科学事实，去论证邵雍关于天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发生一次大开合的谬论，胡说那时“人物消尽，旧迹大灭”。这同西方宗教唯心主义歪曲地质学成果宣扬灾变论真是如出一辙。

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一套科举制度，是用儒家思想束缚、扼杀科学的一条绳索。他们把孔孟之道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以当官晋爵为诱饵，把读书人引上死背“经书”，专作“八股”的邪路上去。鲁迅指出：反动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结果使许多人思想凝固僵化，扼杀了多少新鲜活泼的思想创见。清代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也批评说：“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竞怀侥幸，不务实学”。



事实确是如此。我国历史上那些中状元的人，大都是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的。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敢于同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决裂，摆脱科举制禁锢，打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的人。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明代，有的人连举人没有考取，却在科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如李时珍多年行医，长期上山采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数十年之努力，集药理学之大成，写成医药学名著《本草纲目》。徐霞客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三十多年不避寒暑，不畏艰险，游历考察十六省。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对所到之处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作了详细的科学记录，是宝贵的科学文献。他最早考察了石灰岩地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应星虽然是个举人，但他能够冲破儒家经典的桎梏，深入到工场实地进行调查，写成了总结我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他在自序中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并且清楚地说：“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这是说，世上那些有发明创造的人，是众人推动的结果。象这种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是那些陈腐反动的儒家之徒永远不能得到、也永远不敢承认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那些皓首穷经、追求仕禄的儒生根本达不到的。

综合以上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人民的推动下，法家进步、革新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则恰恰相反，它的思想政治路线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刘少奇、林彪之流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胡说什么儒家是“我国文化的来源”。长期以来，一些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学者”，也多次散布这种胡说。这是对历史严重的歪曲，必须彻底批判。研究儒法斗争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伟大真理，使我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更加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夺取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新胜利，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

陈 今

翻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尊孔思潮的泛起，都有它的国际背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在近代这个尊孔合唱团中，一个是尊孔连着崇洋卖国，一个是尊孔连着侵华反华。研究近代史上这股反动逆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崇洋卖国和苏修新沙皇尊孔反华的狰狞面目。

林彪是当代最大的尊孔派，也是最大的卖国贼。尊孔和卖国的一身而二任，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尊孔和卖国的一身二任，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特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侵略的需要，它们首先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的附庸，“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他们要维护根基脆弱的反动统治，就必然要用孔孟之道作为毒害和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同时需要找洋主子作后台老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尊孔与崇洋成了中国近代反动派须臾不离的东西，两者缺一不可。

在近代，曾国藩是把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相结合的鼻祖。他一面高喊孔老二是“圣之盛也”^①，一面叫嚷乞求洋大人是“第一要务”^②。怎样把尊孔和崇洋勾通呢？曾国藩叫喊“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③。他的所谓经世济用的“经济之学”，就是“通经致用”，通晓载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致封建买办“借洋兵剿贼”^④之用，即用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得明白些，这个“经”和“用”，就是以孔孟之道的“中学为体”，配合坚船利炮的“西学为用”，叫做“中体西用”。一手拿着孔孟之道的软刀子，一手拿着帝国主义的洋刀子，来对



付那时高举反孔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冲锋陷阵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曾国藩则极为惊慌，哀叹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⑤；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攻打太平军，曾国藩便感激涕零地说“有德于我”^⑥。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尊孔和崇洋有着共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妙用。

辛亥革命后的复辟派袁世凯也是这样。他一头伸进二千多年前的孔墓，鼓吹“孔学博大”^⑦，同时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声言对帝国主义“敦睦”是外交政策“唯一之基础”^⑧。他一当上大总统，就迫不及待地为被革命人民冲击了的孔老二恢复名誉，要全国各地举行祀孔典礼，要在全国中小学中恢复读经。袁世凯这个大军阀提倡尊孔读经，目的是要把孔老二当作敲开复辟之门的砖头。他率领百官祭孔以后，回身就跪在洋大人脚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说明，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复辟称帝，单有孔老二作精神保镖，皇帝仍出不了场，还必须有帝国主义的实力支持。但反动派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不预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代价，也是不可能的。在袁世凯身上表现出来的尊孔、复辟和卖国的三位一体，证明尊孔与媚洋是反动派搞复辟的两件法宝。

还有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蒋介石也是这样。他一面吹捧孔老二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⑨，把尊孔读经当作“为政的基本要道”^⑩；一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⑪，实际是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革命的卖国政策。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次反革命“围剿”，三次反共高潮，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发动侵犯解放区的内战，都是在四书五经的“基本要道”指导下进行的。他从北伐战争时期通过大买办虞洽卿牵线，暗中与帝国主义勾结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断送大半个中国，到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利用帝国主义的金元和大炮，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攘外安内”的产物。直到今天，在台湾省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反动派，奉行的还是这条尊孔卖国的路线。正如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的：“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用什么作为卖国、反共的精神武器呢？就是尊孔。在蒋介石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尊孔、反共与卖国的三位一体。一方面尊孔读经，一方面崇洋卖国；



既是孔老二的信徒，又是洋大人的叭儿狗。这就是中国近代反动派的典型特征。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尊孔读经必然走向投降卖国的道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完全腐朽的社会势力。不尊孔他们自身就失去了凭借，不崇洋他们就没有依傍，所以尊孔和崇洋成了他们的命根子。毛主席在揭露蒋介石等人奉行卖国政策的阶级根源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当问题涉及到阶级利益的时候，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就愿意同外国主子勾搭，背叛民族，出卖祖国，这是他们制订阶级政策的规律。清末反动统治者提出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就是一小撮民族败类不惜拿“国耻”换取私利的典型语言。从曾国藩到蒋介石的一串卖国贼，哪一个不把这条卖国政策奉为金科玉律呢？

那末又为什么卖国必尊孔呢？因为孔孟之道可以作为一块粉饰卖国罪行的遮羞布。事实上，近代的反动派无不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卖国的理论根据。曾国藩搬出孔老二的“忠信笃敬”^②，从中引出了对洋主子忠顺厚道的卖国主义理论；李鸿章搬出孔家店的“礼之用，和为贵”，作了适合于卖国政策的解释，作为对帝国主义侵略避战“求和”的理论根据；袁世凯说什么“孔子喜言大同”，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同帝国主义“大同”起来，“几无国界可言”^③；蒋介石根据孔老二的“春秋大义”，制订出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汪精卫引证孔老二“去兵”的说教，鼓吹“和平可以救国”^④。明明是卖国，倒可以说成“救国”，孔学大有用矣！老卖国贼这一套卖国理论被新卖国贼林彪全盘继承下来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就是赤裸裸地打出尊孔、反法、卖国的黑旗，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引用孔孟之道，作为自己妄图在苏修新沙皇的“核保护伞”下称儿皇帝的理论根据。

鲁迅早就指出，从孔孟之道里是能够直接引出投降有理、卖国有理的结论来的。他在揭露投降卖国的孔孟之徒时，说这帮家伙“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花边文学·算账》）请看：当年的“洪宪皇帝”袁世凯、独夫民贼蒋介石向帝国主义“俯首”，今天的卖国贼林彪向社会帝国主义“俯首”，不是表现出同样的政治思想特征吗？



尊孔和崇洋的一身二任，决不仅是中国反动派的单相思，它还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卖国贼尊孔，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国主义尊孔，得到了卖国贼的拥护。一个是尊孔卖国，一个是尊孔侵华，中外反动派的里应外合是通过孔老二这具亡灵作媒牵线的。

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后，逐步找到“以华制华”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手段，即在政治上扶植反动势力，在思想上吹捧孔老二。因此，孔老二这尊被历代权势者们吹捧起来的反革命精神偶像，在中国近代更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吹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号称“国外布道英雄”^⑮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旧学”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新学”，比作侵华战车上的两只轮子，说独轮之车固然可以行走，若改以双轮，就可既“稳”且“速”^⑯，畅行无阻了。这就是侵华需要尊孔的奥妙。因此，他们不再把孔老二看作“上帝”的外道，而尊之为可同耶稣基督媲美的天使。再往后，镇压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八国联军在致清政府的联合照会中，竟然指责中国“殊悖万国之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牾”^⑰，俨然以保卫孔孟之道自命。说起来孔孟也真走运，地位可同“万国公法”并列了。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的尊孔更甚于前。一九一二年来到中国的沙俄伯爵盖沙令，教训中国反动派说：“孔教者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只有阐发“孔教”，才不至于“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⑱。这是何等露骨地表明了孔老二可以起到遏制革命力量的灭火机作用。这个盖沙令，在离开东亚前往美国的旅途上还埋怨老牌传教士说：“没有注意到孔子的优点”^⑲。在他看来，如果充分“注意到孔子的优点”，中国不至有那样多的革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李佳白的美国传教士，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出谋献策说：“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他还宣称“孔圣于二千年前已为后世政治界立永久至善之信条”，把孔学抬到了“人类共通之原理”^⑳的吓人高度。

帝国主义侵华好汉们对孔学的妙用，随着侵华的步步深入，也越来越高超了。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宰割中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皇威廉二世竟说：“中国有中国之文化，务当保存。德国学校，应增入孔教。”^㉑说来真妙，洋“儒”主张在外国学校中“增入孔教”，袁世凯同时鼓吹在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中外反动派都唯恐孔教断了香火，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列宁在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侵华的强盗行径时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



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个反动联盟的精神纽带，就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尊孔。一个是尊孔和卖国相结合，一个是尊孔和侵华相结合，在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外反动派联合尊孔的罪恶目的，是要使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沦为亡国奴。三十年代大资产阶级尊孔和崇洋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他们一手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宣称为“王道乐土”。在那里，大造孔庙，学校读经，祀孔有歌，“日化”和“圣化”结为一体。这种“圣化”随着“日化”扩大，正如伪晋北政府的《晋北之歌》唱的那样：“尊孔孟，睦善邻，重仁义，尚和平”，活现出了一个直接统治中国国土的外国孔子。当时有些民族败类把帝国主义这类侵华尊孔的丑戏，竟说成为“儒者之泽深且远”^②。这个“深且远”倒是说明了，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对两千多年后的中外反动派都很有用处。

事实正是这样。最近在世界的某些阴暗角落里，就演出了一幕幕的尊孔闹剧。其中，演得最卖力的，当数苏修新沙皇。人们不禁要问：堂堂“超级大国”的头子，为什么要拜倒在二千多年前的干瘪老头孔老二脚下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恐怕还是鲁迅早就指明了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老调子已经唱完》）苏修新沙皇一直支持刘少奇、林彪这类现代中国的孔家店门徒搞资本主义复辟，其罪恶目的还是沿着老沙皇走过的老路子，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为他们的一块殖民地！

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史的对立面的，是中外反动派尊孔侵华史和尊孔卖国史。尊孔侵华和尊孔卖国，是中外反动派的绝妙双簧！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外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反复地批判了阻碍中国革命前进的孔孟之道，批判了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历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立，配合帝国主义的尊孔侵华搞尊孔卖国，则成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一个重要特点。钻进党内最早的尊孔派陈独秀，在大肆鼓吹孔孟之道的同时，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分子打得火热，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王明对孔



老二高呼“堂堂夫子”，最后卖国改姓，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宠犬。刘少奇一手导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剧，一手炮制了“三和一少”的卖国投降外交路线。林彪更是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的典型代表。他一方面从孔孟之道中拾破烂，铸造复辟倒退的理论武器，一方面又寻求苏修作为他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靠山。林彪反党集团搞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是他们卖国投敌的自白书。他打算象当年袁世凯拿“二十一条”换取皇冠一样，妄图借苏修新沙皇来“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这就有力证明，林彪既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又是苏修新沙皇的可靠走狗。从陈独秀到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们，都鼓吹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正好说明他们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共同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又同外国反动派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林彪尊孔读经和崇洋卖国的罪恶活动，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这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妄图借助尊孔卖国派在中国搞颠覆，是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只要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尊孔卖国派就不会绝迹。因此，尊孔崇洋与反尊孔崇洋的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地继续下去。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于外国的文化，古代的文化，我们都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态度，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崇洋，就是“全盘西化”，它抹煞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把一切都说成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好的。

当年主持洋务活动的李鸿章，就是由崇洋走向卖国的黑标本。他曾经无耻地宣称自己“喜谈洋务乃圣之时”^②，的确，洋务也颇行时了一阵子。媚洋能手李鸿章，不仅在政治上“联各国之好”^③，在军事上购买洋枪洋炮，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乞讨外国资本的叫化子。设备、原料、技术统统靠帝国主义洋大人“恩赐”，办工厂还得雇洋专家主持。总之，一切都“洋”化了。这个家伙最后出海从洋，一头钻进老沙皇的怀抱，成了老沙皇在中国的超级走狗。国内外的事情都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政治上也是不能自主的。苏修搞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向我们提供了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这个全力建立殖民大帝国的新沙皇，



通过什么“经互会”、不等价交换、高利贷款、专家控制等等手段，死死掌握了“大家庭”成员国的经济命脉，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销售市场和附属加工厂。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不过是新沙皇进行弱肉强食，控制、掠夺、剥削“大家庭”成员国的圈套。刘少奇、林彪之流推行的洋奴哲学，实际上也是要把中国的一切都交给“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老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所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对洋奴哲学的有力批判，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今后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反对洋奴哲学，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看到了尊孔和复辟的联系，逐步看到了尊孔和卖国的联系。因而也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复辟必尊孔，反复辟必反孔；卖国必尊孔，爱国必反孔；侵华反共必尊孔，反帝反修必反孔。今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英勇奋斗。中国人民一定会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让尊孔、卖国、侵华的中外反动派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发抖吧！

注：

-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 ③ 《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问学》
-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议覆借洋兵剿贼片》
- ⑤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匪檄》
- ⑥ 《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治道》
- ⑦ 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文》
- ⑧ 袁世凯：《答外交团颂词》
- ⑨ 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1928年6月
- ⑩ 蒋介石：《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1936年3月13日
- ⑪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
- ⑫ 《曾文正公全集》，书牍，《覆李少荃》

- ⑬ 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
- ⑭ 汪精卫：《纪念孔子的意义》，1940年8月27日
- ⑮ 《李提摩太传》封面用语，上海广学会出版
- ⑯ 李提摩太：《新政策》
- ⑰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二卷，第132页
- ⑱ 盖沙令：《论中国之新命系于孔教》。《孔教会杂志》第一号
- ⑲ 盖沙令：《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英译本，一九二五年纽约版
- ⑳ 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 ㉑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记德国名汉学家卫理贤博士》
- ㉒ 转引自鲁迅《儒术》，见《且介亭杂文》
- ㉓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朋僚函稿》卷十六
- ㉔ 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卷一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

钟 达

王充是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者，是公开举起“伐孔”、“刺孟”的战斗旗帜的进步思想家。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孔孟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时代。

西汉王朝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它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路线，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都是尊法的。到了西汉末期，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世家豪族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土地大量兼并和集中，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激起农民的反抗，到处举起起义的火把。地主阶级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吓破了胆，他们一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乞灵于孔孟之道，大肆提倡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孔孟儒学，主要是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作为麻痹、瓦解广大农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武器。从汉元帝刘奭开始，儒家思想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汉光武帝刘秀依靠世家豪族残酷镇压了绿林、赤眉起义，建立东汉政权以后，对儒学更加大力提倡，竭力宣扬被称为“图讖”的神怪预言。谁对孔丘和儒家那一套反动迷信的东西稍有怀疑和不敬，就要被扣上“非圣无法”的罪名，有丢掉脑袋的危险。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刘炟亲自主持了大规模的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加以条理化，儒学的地位也提得更高。

面对这股独尊儒术的逆流，王充挺身而出，不怕讥笑，不怕迫害，写出了《论衡》一书，把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提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勇敢战斗精神。

在《论衡》一书中，最有光彩的篇章是《问孔》、《刺孟》。在这里，王充以孔



丘、孟轲的代表作《论语》、《孟子》为靶子，从他们的言行中找出“相违”、“相伐”的大量事实，运用形式逻辑，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孔丘不是宣扬“仁义”吗？他口口声声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却很想到佛肸和公山弗扰那里去做官。子路问他，你不是说“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吗？他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一会说是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一会又赤裸裸地宣称，我不是瓠瓜，不能挂着做样子不吃饭。王充指出，孔丘讲话没有准，办事也不会有准。他把自己比做瓠瓜，说做官是为了混饭吃，“何其鄙也”；他同公山弗扰、佛肸等坏人勾勾搭搭，又“何其浊也”。在这里，王充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看出孔丘在政治上的反动本质。实际情况是，公山弗扰和佛肸，当时都是企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叛乱分子，孔丘想到他们那里去做官，乃是为了搞垮鲁国和晋国的革新势力，实现其“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的野心。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对于革新势力是恨之入骨的。涉及到政治问题，他就完全抛掉“仁义”的伪装。以宰予昼寝为例。宰予打瞌睡本来是一件小事，孔丘却摆出一副恶霸脸孔，大骂宰予是“不可雕”的“朽木”，是“粪土之墙”。王充认为，宰予犯了打瞌睡这样的“小过”，孔丘把他比做不堪造就的朽木粪土，是小题大做了，不足以服人。实际上，孔丘骂宰予是事出有因的，是因为宰予政治上同他有分歧，不同意他的政治主张。

孔丘不是宣扬“礼”吗？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他哭得好象很伤心。可是，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口外棺的时候，孔丘却马上板起面孔，一口拒绝，说什么“大夫出门不能步行”。还对别人说：“我儿子死也没有给他买外棺。”王充指出，孔丘为了保持大夫身分，不肯卖掉车子为学生和儿子下葬，是贪恋官位，爱摆架子。他质问孔丘：你说“君子杀身以成仁”，为什么不能放弃爵位来坚持“礼”呢？在这里，王充尖锐地揭露了孔老二言行不一及其所宣扬的“礼”的虚伪性。但是，他没有从政治上看到“礼”的反动本质。事实上，孔丘的“礼”是为政治服务的，他鼓吹“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

孔丘不是宣扬“信”吗？其实他的假话是说得最多的。孔丘曾经叫嚷要跑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王充就质问他，你的政治主张在中原还行不通，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怎么能行得通呢？你不是说，那里的事情比中原更难办吗？好办的地方都行



不通，难办的地方就行得通吗？王充正确地指出：孔丘并不是真的想到中原以外的地方去，而是有意撒谎。他骂别人是强嘴利舌的“佞者”，其实他自己正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佞者”，一个伪君子。说假话，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共同特点。他们为了实现其反动政治主张，总是嘴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孟轲就曾经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恰巧反映了这些没落阶级代表人物的腐朽性和虚弱性。

王充是反儒斗争的战士。他虽然没有从路线上批判孔丘的反动本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这样大胆地指着孔丘鼻子，骂他又鄙、又浊、又贪、又佞，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种尖锐的批判，一直激励着后来进步的思想家的批孔斗争，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是深远的。

在《刺孟》篇里，王充对孔丘的继承者孟轲所宣扬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反动观点的批判，是很有光彩的。孟轲说：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王充认为，孟轲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帝喾、尧、舜、禹都是“王者”，他们是“继踵而兴”的，没有隔五百年；由周到孟轲已经过了七百年，也没有兴起“王者”。五百年是上天生“圣人”的期限吗？如果是的话，到了期限，上天为什么不准时生一个“圣王”呢？王充指出，孟轲满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政治野心，由于没有掌握到政治权力而“怀恨”，所以尽说些经不起事实考验的骗人的“浮淫之语”。王充批驳孟轲所发挥的这些思想，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作为封建社会的先进思想家，王充主张革新，反对倒退，因此他敢于向儒家的“天才论”宣战。修正主义的头子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亦步亦趋地跟在孟轲之后，叫嚷“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自己。他这种反动观点，正是王充在一千九百年以前在批判孟轲时就驳斥过了的。当然，王充还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彻底地批判这种反动的“天才论”，这个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王充的《论衡》，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天命论在汉代的翻版——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把天说成有目的、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把世间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和加以安排的。人如果顺应天的意志，天就降福，



否则就降祸。他还炮制了“君权神授说”，宣扬“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假借“天意”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

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吸收了汉代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形成的，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感觉、目的和意志的物质实体。“天道，自然也，无为”（《谴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安排世界的最高主宰。“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而行而应人”（《明雩》），孔丘和儒家的经典动不动就讲天命，其实只是吓唬和愚弄人民罢了。这样，王充就继承和发挥了荀况“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君权神授的基础。王充还针对儒家提出的天能降祸降福以及自然灾害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的观点，考察了当时所谓灾异，如日月食、地震、雷雨等，指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告”。他认为，儒家编造的“谴告”是和“礼”一起搞出来的。上古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谴告”。只有“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疑时至”，即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灾异很多的情况下，才“造谴告之言”。所以他说：“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自然》）就是说，“谴告”的出现，反映了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加深。王充虽然没有揭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谴告”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阶级本质，但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它是同政治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当时，这也是很高明的见解。

王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宣传无神论，反对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他提出了关于形体和精神关系的著名论断：“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他指出精神是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从而否定了一切鬼神的存在，这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有力批判。他的战斗成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王充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范缜、吕才、张载、王夫之，都受过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

坚持法家主张革新、前进的观点，反对儒家“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的历史倒退论，也是王充《论衡》一书的鲜明特点。

董仲舒叫嚣“奉天而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大肆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他诋毁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象朽木泥墙一样，无法修补，只



有推行孔孟之道即开历史倒车是唯一的出路。王充是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的，认为它取得了“为秦开帝业”的重大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他指出，怀有今不如昔、汉不如周的成见的俗儒，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越古越好，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在《宣汉》、《恢国》等篇中，王充高度评价刘邦打败项羽分裂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的成就，对汉朝的建立和西汉前期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的措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秦汉之际，功奇行殊”（《齐世》），但被儒家贬低和轻视了。他从各方面把汉代和周代作了比较，指出汉代国土的开辟远远超过了周代；在生产力提高方面，周代的荒野地区到汉代已有很多开成肥沃的田地；汉代在精神文化上也比周代发达。一切都证明“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他还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发展，举出古代的人吃不上五谷，也没有衣服穿，现在却“穿地为井，耕土种谷”，“有布帛之饰”等事实（《齐世》），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他嘲笑儒家说，你们“上则求虞夏，下则索殷周”（《齐世》），对古代的东西津津乐道，但对于当代的成就却反而全不看在眼里，“知古不知今”，简直是昏昧透顶！儒家说“汉不及周”，鼓吹一代不如一代，是十足的反动的历史倒退论。王充肯定“汉高于周”，汉“在百代之上”，则坚持一代胜过一代，继承了法家的反复古主义的传统。

王充的反儒斗争，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的。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先秦以来的儒法之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充反对儒家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在《问孔》、《刺孟》等篇中，对孔孟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主要是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孔孟言行的矛盾、言论和事实的矛盾及言论本身的矛盾，没有抓住路线问题。在《非韩》篇中，王充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态度显然和对待儒家的态度不同，但是对韩非的政治主张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指责韩非只讲耕战，不讲礼义；只讲刑，不讲德，认为儒者是代表礼义的，不可缺少，不同意韩非关于儒居于“五蠹”之首的观点。这恰恰暴露了他不能从路线上分析问题。在讲到秦统一六国时，他也没有抓路线问题，只说是“秦以兵强，威无不胜”。至于秦为什么强，他就说不上来了。

为什么王充会写出《非韩》篇呢？



第一，他没有看清法家和儒家是互相对立的政治力量，没有把儒法斗争看成路线斗争。法治还是礼治，这是从先秦到西汉儒法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实质就是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制。“复礼”是奴隶制复辟势力抛出来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而“明法”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封建制的战斗口号。韩非认为“法”是最高的原则，他说：“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韩非子·问辩》），而斥儒家的“礼”是“乱之首”（《韩非子·解老》），观点十分鲜明。王充却企图把这两个对立面调和起来，把它们说成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因而指责韩非“废德”“任刑”是走偏了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王充比起韩非来，就后退了。

第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思想影响。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奴隶制残余势力日益走向妥协，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这时，儒家也将“礼治”改头换面，打扮成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德治”，以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他们吹嘘“德治”，说什么“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强调“德治”有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和欺骗人民的作用。这一转变对东汉前期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桓谭、王符等人也发生了影响，对王充也不例外。尽管王充曾反驳过儒家关于“德治”的吹牛，指责孔老二要人民饿着肚皮谈礼义，但是，他还是受到了“德治”的观点的影响，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历史上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礼治的争论，结果竟得出了与他自己的反儒斗争精神相矛盾的结论。

历史经验表明，儒法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儒，而不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从儒家的阶级本质上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是不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的。而这正是为什么王充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儒家的战斗旗帜，但反儒不彻底的关键所在。这个彻底批判儒家思想的历史任务，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就有可能完成过去一切时代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韬晦之计和林彪的复辟阴谋

师 平

在林彪的卧室里，挂着他亲手抄录《三国演义》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死党还在黑笔记里记下林彪口授的话：“韬讳（晦）”“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林彪对这首诗和两句话奉为至宝，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妄图用韬晦之计，“随机应变”地隐蔽其反革命真象，进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活动，以实现其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大志”。

用韬晦之计进行阴谋活动，并不新奇。早在殷末周初，奴隶主贵族在《周易》中就提出了“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潜伏不动，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春秋末期，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政治骗子孔丘，为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进行反革命复辟，便苦思焦虑治《周易》，对“潜龙勿用”一类思想作了精心的解释和发挥。他在《易·系辞》里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他以尺蠖爬行和龙蛇冬眠作比喻，告诉奴隶主贵族对屈伸之术要研究得“精义入神”，以便“致用”，达到复辟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目的。此后，儒家之徒不仅互相传习孔丘的屈伸之术，而且在诗文中将其概括为“韬光”或者“韬晦”，竭力加以宣扬和美化。东汉三国时，孔丘的第二十代孙、豪门大族孔融在一首诗里说：“蛇龙之蛰，俾也可忘。玫瑰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离合群姓名字诗》）他在这里自比龙蛇和美玉，妄图把踪迹隐藏起来，把光芒收敛起来，以便进行阴谋活动。西晋时，出身孙吴大士族的陆机，从小“服膺儒术，非礼不动”，吴亡后一度退居旧里，闭门观时，在文章中也以“韬迹匿光”为标榜。宋朝反动道学家朱熹，对孔丘关于“以屈求伸”的几句话，作了详细注解，说什么“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公然把阴谋家的骗术提到了“理”的高度。他还总结历代反动统治经验，用“遵养时晦”（隐居待时）规劝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时机不到的时候，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然后才能一举而“天下大定”。（《诗集传》）朱熹去官以后，退居建阳山中，号称“晦翁”，著书授徒，仍不忘以屈求伸。林彪这个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把历代



反动儒家的这一套屈伸之术继承下来，以韬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充分表明他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出关〉的“关”》）以屈求伸，以柔进取，从来是野心家、阴谋家惯用的卑劣伎俩。在历史上，每当革命势盛，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要乞灵于韬晦之计，进行垂死挣扎。在秦王朝建立封建制度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不甘心失败的奴隶主阶级，就曾经使用孔丘的屈伸之术，向新兴力量作拚死的斗争。奴隶主贵族公子虔反对商鞅变法受到惩罚，就八年“杜门不出”，等待时机。秦孝公一死，他立即联合抬了头的复辟势力，残酷地杀害了杰出的法家商鞅和他的全家。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秦国叛将樊于期，怀着“切齿腐心”的仇恨逃到燕国，和麇集在那里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进行阴谋活动，最后割下自己的头颅，让政治流氓荆轲持往秦国，妄图借机刺杀秦始皇。秦朝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原六国没落贵族纷纷“以屈求伸”。孔丘的后代孔鲋隐匿不出。楚将项燕之后项梁“避仇于吴中”。魏国“名士”张耳、陈余被秦通缉，逃到陈地，自称不因“小辱而欲死”，等到陈胜起义后，他们就趁机四出奔走，策划“立六国后”，妄图复辟。在近代，每一次革命高潮来临，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更是力行此道。他们或隐匿不出以“遵养时晦”，或混进革命队伍里投机钻营，无不千方百计地保存自身，积蓄力量，窥测方向，选择时机，以便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置革命于死地。林彪就是接过历史上这些反动派所惯用的手法，向党 and 人民猖狂进攻的。

自古以来的反动派把实行韬晦之计作为一种策略，这是由他们既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而又无力进行公开对抗，这样一种极其反动而又十分虚弱的本质所决定的。林彪所以欣赏《三国演义》里的那首诗，因为他的心是与之相通的。他用这首诗道出了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极端虚弱。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巩固。党政军民坚强团结。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在这种形势下，林彪既要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又怕露出狐狸尾巴，所以他把“忍耐”作为所谓“大度的科学根据”。他时时提醒自己及其死党，要注意“忍耐”，做到“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不要因为“区区小事”，耽误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终身大事”。即使他们反革命的野心已经按捺不住了，也还要借助“韬晦”，不能“说破”。可见，他们是何等的心虚胆怯！

“韬晦”和“忍耐”，都只能是暂时的，最后总要暴露。因为，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虽然说的是什么“忍耐”，其实内心是急不可待。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能和对于革命事业的极端仇恨，注定了他们一定要自



已跳出来。建国以来，每隔那么几年，总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跌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他们互相来往的密信里，有许多处讲到“忍辱”之术，什么“忍辱负重”、“保存力量”，什么不能“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不能有一点不必要的伤亡”，讲究“忍耐”可谓周密。然而曾几何时，他们自认为时机已到，就声言要“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隐藏在党内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也是按照这个规律，一个个跳出来向党进攻，又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同样，仇恨党、仇恨革命、仇恨人民达到了疯狂程度的林彪反党集团，又怎么能长期“忍耐”呢？他们利令智昏，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仅仅一年的时间，就猖狂地连续发动了两次反革命政变，使自己失败得更惨重，更彻底。这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屈伸之术还没有研究得“精义入神”，而是他们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韬晦之计，实际上也只能是一条失败之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对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科学的总结，同时也从本质上指出了无产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公开申明，我们党是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事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从来主张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历史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兴的革命阶级，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就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在政治上主张光明磊落，反对阴谋诡诈。他对儒家骗术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指出：“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天论》）

锄了毒草，可以化为肥料。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了，但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那就是它又一次丰富了我们同反革命两面派作斗争的经验，并且留下了一批足以使我们提高革命警惕的反面材料。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研究和批判这些材料，好好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可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沈 思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与之相适应，他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就是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把它当作标榜林彪这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的一根精神支柱，吹得神乎其神，借以招摇撞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批林批孔运动朝着深入、普及、持久方向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彻底批判林彪所谓的“战术原则”，戳穿它的画皮，揭露它的实质，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炮制出笼的。从它出笼的历史背景看，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谈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时，曾经正确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



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在这事关前进还是倒退、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指出了我们党已经有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全党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了，解放区扩大了，军队发展了，面前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困难不可克服。毛主席从对形势的科学分析出发，作出了“我必胜蒋必败”的英明论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号召全党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自卫战争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主席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要求我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对于东北地区，毛主席全局在胸，高瞻远瞩，于一九四五年秋天，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广泛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同年年底，又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不仅对东北解放战争关系极大，对全国局势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和一系列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军民粉碎蒋介石进攻的信心，指引着我们去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全国形势和东北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证明了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

与毛主席对形势的科学分析相反，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看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大好形势，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为敌人暂时和表面的强大吓破了胆。他害怕战争，幻想和平，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公开宣称“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妄图断送革命，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奉送给蒋介石，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林彪在政治上实行投降主义，决定了他在军事上必然搞右倾保守主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军队开始向东北发动进攻，本应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歼灭。林彪却避而不打，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时机。随后，他又抗拒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主力部队放在交通干线，一味与敌人拚消耗，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其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当国民



党不断增兵，大举进攻东北的时候，他又实行逃跑主义。综观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林彪极力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时而搞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打“硬拼仗”、“莽撞仗”；时而搞军事保守主义，不敢斗争，不敢胜利。林彪所谓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炮制出来的。这是他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要害是反对打歼灭战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同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相对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要害是反对打歼灭战，鼓吹打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歼灭战，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通过不断消耗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直到最后战胜敌人。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毛主席历来提倡歼灭战，反对打击溃战，反对**“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在人民战争基础上，**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是唯物辩证法在军事上的具体运用。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少胜多，转弱为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分不开的。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违反**“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和歼灭战思想背道而驰。早在“一点两面战术”出笼时，毛主席、中央军委就发电询问林彪“一点两面”战法是什么意思？他诡辩说：“‘一点’是打垮敌人，‘两面’是把打垮的敌人消灭”。林彪在这里尽管用了“打垮”、“消灭”的字眼，却掩盖不住他那“一点”把敌人赶跑、“两面”把敌人放走的击溃战本质。毛主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而林彪的“一点两



面”，与毛主席的指示截然相反，抛开战役、战斗总体上我对敌兵力对比要占绝对优势的原则，只搞自己同自己的“点”与“面”的兵力对比，把“九分之八”的力量放在“点”上，把“九分之一”的力量放在“面”上；只在两面部署兵力，反对四面包围，胡说什么采取四面包围会“逼迫敌人作困兽之斗”。按照这样的部署，“点”上貌似集中兵力，实际上头尖尾巴长，使我军在狭窄地段孤军进入，大部分兵力有劲使不上；而在面上由于兵力薄弱，形不成四面包围，又不能断敌退路，敌人想溜掉就可以溜掉。按照这种打法，即使有可能在“点”上把敌人打垮，也不能在“面”上把敌人消灭。“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抽掉了集中兵力、四面包围，也就取消了歼灭战。林彪侈谈“一点两面”是什么“歼灭的战术”，完全是谎言。

毛主席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运动战是转换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是我军歼灭敌人的主要作战形式。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敌人转入守势，我军转入战略进攻，还需要以阵地战配合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夺取敌占城市。所以，毛主席所讲的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为了打歼灭战。而林彪却用“阵地战”之名，行反对打歼灭战之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军事冒险主义碰壁之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军事保守主义。林彪正是这样干的。不该打阵地战，他“蛮干”、“硬拚”，需要打时他又不肯打。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多次电令林彪迅速攻克锦州，“关门打狗”，他却迟迟不动。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既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的运动战，也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指引下的阵地战，归根结底是反对打歼灭战。

局部服从全局，是进行革命战争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保证。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林彪在“六个战术原则”中，公然鼓吹分散主义，说什么“四快一慢，其实是一个慢字”，“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这样，就把搞好准备与把握战机对立起来，把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与机断行事对立起来，把局部与全局对立起来。林彪在“慢”字背后，包藏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统一指挥的祸心。在辽沈战役中，林彪就制造种种所谓没有准备好的“理由”，迟迟不将主力南下北宁线。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去电催问，他一会儿强调“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一会儿借口“全军皆无雨具”不能行动。实际上，林彪强调“准备”是假，消极避战是



真。“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有准备以有胜利把握为前提，任何战役战斗都必须有准备，准备愈充分，胜利的把握就愈大。但是，作战行动不能光看局部的准备情况，而必须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有时全局已经准备好了，为了全局的胜利，局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好，也要克服困难投入战斗。如果以“准备”为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必然造成使本来分散孤立之敌变为集中强大之敌，使运动之敌变为驻止之敌，使立足未稳之敌变为坚守防御之敌，以致最后造成好打之敌变为不好打之敌，使有把握的歼灭战，变为击溃战、消耗战。可见，“四快一慢”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根本错误的。

打歼灭战，还是打击溃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历来是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在作战指导原则上的根本分歧。我们以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为武器，紧紧抓住这个问题，就能击中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要害，把它批深批透。

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林彪“六个战术原则”的认识论根源也正在这里。

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客观实践中产生的，还是凭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这是两种认识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是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离开了战争的实践，就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毛主席是我军的缔造者、指挥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科学地总结了我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法。它来自战争实践，又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完全正确的。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败国内外敌人的战斗历程充分说明，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方法去打仗，就无往而不胜。

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是主观唯心论的产物。在抗日战争中，他直接参加作战只有半年。解放战争初期来到东北不到一个月，既不搞调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又不考虑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对部队的作战经验也置若罔闻。仅仅打了一次小规模阻击战，他就炮制出所谓的“一点两面”、“三三制”；



在一次失利的城市攻坚战中，又炮制出所谓的“四快一慢”。林彪不打自招地供认，他的“战术原则”，是今天“想”一个，明天“想”一个，靠他那“特别灵的脑袋”想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因而，必然经不起战争实践的检验。事实也就是这样。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凡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而打的仗，就取得胜利；凡是受林彪“六个战术原则”干扰而打的仗，就使战果受到影响，部队受到损失。

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人们无论办什么事情，只有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才能对事物取得规律性的认识。指挥打仗也不例外。离开战争实践，只靠关起门来冥思苦想，是决然发现不了战争奥妙的。我们强调正确作战指导原则对作战实践的依赖性，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要更好地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指挥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同客观相符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才能指挥军队多打胜仗，少打败仗。林彪明明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狂热鼓吹者，却恬不知耻地吹嘘他的所谓“战术原则”是“东北作战的根本经验”，他的死党也胡诌什么是“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集中的结果”。革命导师列宁在揭露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时指出：“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林彪一伙正是在“经验”这个字眼下，玩弄鱼目混珠的诡计，妄图把他们那套主观臆造的唯心主义黑货，伪装成为唯物主义的东西抛出来害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战争本身是生动的、发展的、变化的。作为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牢牢把握战争胜利的主动权。林彪的一套所谓“战术原则”，完全违背了战争发展的辩证法。他用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战争，用死数字“编串子”，把这种黑货当成固定不变的“模式”，千古不变的教条。其实，打起仗来，两军对战，情况千变万化，打法多种多样，怎能机械地规定为“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呢？应当根据敌情、地形、任务和我军的技术装备情况，去采用适宜的战斗队形和战斗编组，还要不断总结广大指战员在实战中创造的各种经验，怎能刻板地固定为“三三制”、“四组一队”呢？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一个“模式”去硬套，只



能是“限制”自己，有利敌人。林彪搞的这套“数字”游戏，是道道地地的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对军事辩证法的否定。

我们承认作战指导原则是可变的，并不否认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本身的相对固定性。“**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就会犯错误。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战场，确实给未来战争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必须看到，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其性质仍然是人民战争，所以，反映人民战争规律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包括十大军事原则，仍然是必须坚决遵循的。只要我们结合新的情况，贯彻这些原则，就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林彪正象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那样，为了欺骗群众，玩弄了种种诡辩的手法。他一会儿说要搞“一点两面”，一会儿又说可以“一点多面”；一会儿说“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一会儿又说“打仗就是要服从命令，不管思想通不通，命令一来就得执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应当从林彪所玩弄的模棱两可的诡辩手法中，看到他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机械论的本质，看到他炮制的所谓“战术原则”，是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为特征的，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为篡党夺权造舆论

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早在战争年代就遭到部队的抵制。他曾气急败坏地责备广大指战员对他那一套“视若无睹，听若无闻”。后来所以喧嚣一时，流毒甚广，是林彪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大肆鼓吹、积极兜售的结果。他们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林彪是混进我们党内的反革命两面派。当他窃取权力不久，就赤膊上阵，胡说什么“打仗的问题很多，一定要抓住主要的”，“一点两面”、“三三制”这几项没搞好，“别的东西搞的再多也不起作用”。这是林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无耻吹嘘自己的丑恶表演。其险恶用心，就是妄想把他自己装扮成“天才军事家”，为他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提供根据，进而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林彪及其死党，是一批信奉孔老二“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正名”论者。为了“名正言顺”地篡夺军队的领导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塞进林彪的私货。在一九七〇年的一次修改条令、条例会上，林彪死党露骨地提出：符合林彪“指示”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删掉，体现不充分的要充实提高。经过修改后的条令、条例，几乎成了“六个战术原则”的注释。林彪大加赞扬地说：这些条令、条例“全部都好”。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妄想实现“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狼子野心。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加紧进行其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与此相适应，林彪反党集团吹捧“六个战术原则”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加速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政治上坚持设国家主席，理论上鼓吹“天才论”，组织上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军事上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出笼的大毒草《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竭力吹捧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蓄意篡改历史，把毛主席、党中央英明指挥所取得的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颠倒成了林彪“战术原则”的功劳。真是不识人间还有羞耻事！与此同时，林彪反党集团还把林彪过去有关讲述“六个战术原则”的黑文章，编印成黑书，大量出版。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林彪反党集团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一个劲地加印这本黑书，广为散发，并无耻吹嘘说：“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学、军事学”。毛主席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林彪反党集团也是这样的蠢人。他们著书立说吹捧和兜售“六个战术原则”，原想大树特树林彪，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服务，谁知弄巧成拙，这些黑文黑书成了我们今天清算林彪篡党夺权罪行的有力证据。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深入地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他的“六个战术原则”。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党支部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对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批判，使大家更加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增强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动政治路线的同时，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前一阶段，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我们连许多干部战士就曾联系林彪破坏我军建设的罪行，揭露和批判他搞复辟倒退的反动实质。这使我们认识到，为了深入批林批孔，必须进一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在各个领域，军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样是以反动的孔孟之道为其重要思想根源的。对它进行深入的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为了使干部战士认清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重要意义，我们组织大家研究了儒法斗争史，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孔老二在政治上要“克己复礼”，在军事上就提出“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主张军队必须为“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服务。著名的法家商鞅，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在军事上就主张“缘法而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在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同时，也相应地推行一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都十分重视彻底清算他们的反动军事路线。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一定的军事路线都是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为其服务的。伴随着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的斗争，也必然有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因此，批判反动的政治路线，同时必须相应地批判其军事路线，清算它在军事上的影响。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达到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极力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利用窃取的权力，拼命地在全军、全国兜售他的黑货。我军广大指战员是坚定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林彪篡军夺权的阴谋终于成了泡影。但是，他的那一套货色，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战士们说：“不彻底清算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不能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好地贯彻落实。”

毛主席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抓住它的实质，联系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对他的种种谬论进行由现象到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样，才能使批判击中要害，在路线上分清是非。例如，在批判林彪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罪行时，我们就引导干部战士把它同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秘密组织反革命“舰队”等阴谋活动联系起来，使大家看清了林彪的反革命用心，就是妄图夺取无产阶级的兵权，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又例如，在批判林彪推行的所谓“四好”、“五好”时，我们就引导大家联系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弄清“好”与“不好”，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林彪一方面讲什么“政治思想好”，一方面却反对部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反对对部队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要人们做复辟倒退的顽固派董仲舒。可见他的“政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所谓“思想”也是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按照他的反革命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军队。这样，把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剖析其实质，大家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正如战士们说的：“打靶要瞄准靶心，打蛇要打中七寸。联系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剖析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实质，就打得准，批得深。”

长期以来，林彪肆意篡改历史，极力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了弄清林彪的军事路线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引导大家联系我军两条路线斗争史，批判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动言论和行动。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受到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积



极追随王明路线，宣扬“短促突击”，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集中兵力和打运动战的正确方针。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并在重大的战略行动上，对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调度和指挥。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一九四〇年，他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地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大家把林彪的种种罪行同当时王明、刘少奇的言行加以对照，就清楚地看到，林彪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是站在机会主义路线一边，都是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干部战士们以历史的铁证，深刻地揭露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

我们还组织大家对我军战史上的典型战例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更加看清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性。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我军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抓住决战时机，毅然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主席正确地首先选定了辽沈战役为决战方向，科学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南下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把东北敌人就地歼灭。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又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入关，实行对华北敌人的包围和分割，粉碎敌人逃窜的企图，进行就地歼灭。毛主席关于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然而，林彪以唯心主义估量形势，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看不到决战时机已经成熟，根本没有敢打必胜和打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在辽沈战役中，他顽固地反对毛主席关于东北我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在平津战役中，他拖延入关时间，不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毛主席粉碎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才取得了辽沈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通过分析和批判，大家深刻认识到，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胜利。林彪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反对进行战略决战，实际上就是要给国民党反动派苟延残喘，重整旗鼓，向人民反扑提供机会，阻止和反对革命人民去夺取胜利。

我们在斗争实践中还体会到，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林彪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往往采用以假乱真的手法，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以推行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剥掉他的伪装，分清路线是非，就要依靠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同时，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内容庞杂，浸透了孔孟之道，充满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理解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才能抓住要害，批深批透。因此，我们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每一个问题时，都注意选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为了批判林彪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对抗毛主席军事路线的罪行，就学习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光辉著作。为了批判林彪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罪行，就选学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论述。这样，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

在批判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时，我们选学了马列关于军事问题的论述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批判了所谓“六个战术原则”的反动实质。大家认识到，战术原则是军队作战行动的指导原则，是在一定的战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光辉结晶，它系统地指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其精神实质，就是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打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歼灭战。相反，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则是主张平分兵力，打击溃战和那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他的那一套，违反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作战规律，无视我军在几十年革命战争中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凭主观臆想炮制出来的。大家在批判中认清了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的反动实质，分清了路线是非，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连队得到更好地贯彻落实，促进了军事训练。

通过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推动了连队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还是初步的，决心继续努力，把它批深批透，使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批林批孔 促进战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六连党支部

我们连队驻守在伟大祖国北部的边疆地区，担负着光荣而繁重的战备任务。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党支部始终抓住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组织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紧密结合战备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及其叛国投修的罪行。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提高，连队的建设有了进一步加强。同志们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决心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站好岗，放好哨，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

我们连队联系战备实际，深入批林批孔，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教育干部战士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牢记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牢固地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一提起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把剥削和压迫的枷锁重新套在劳动人民身上，干部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在开展群众性革命大批判中，我们挑选了七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干部战士，组织巡回批判组，深入到各个哨所、执勤点，用地主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事实，揭露和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有一位副连长，一家四口人被吃人的旧社会夺走了三口，父亲被国民党抓壮丁遭受残酷压迫致死，哥哥也被抓壮丁进了虎口，母亲带着他逃荒要饭，连病带饿悲惨地死去。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解放了他的家乡，才使这个孤儿见到阳光。听了这一桩桩血泪控诉，干部战士愤怒地说：林彪要“复礼”，就是搞复辟，想把我们重新推进火坑，这万万办不到。

在忆苦的基础上，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把对“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批判进一步引向深入。同志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剖析林彪“复礼”的实质，



弄清了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就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维护和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一样，但都是代表着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都是为了开历史倒车，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大家重新学习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联系历史上每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伴随着出现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必须牢记我军的根本职能，紧握枪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坚决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

通过深入批判“克己复礼”，极大地增强了干部战士保工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感。干部热爱自己的战斗岗位，他们说：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万事中的“大事”，我们要把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毕生大事，象守卫珍宝岛的英雄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安心部队工作，和新战士并肩战斗在边疆。今年有四名战士复员，行前晚上还要求党支部让他们在祖国边疆站最后一班岗。这都反映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通过批林批孔的斗争，觉悟空前提高，斗志更加昂扬。

批判林彪卖国投修的罪行，进一步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时刻警惕它们可能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

林彪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无耻地宣称要“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在反革命政变阴谋破产以后，又仓皇逃命，投奔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同志们对林彪这种出卖祖国、投靠苏修的可耻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连同志一致认识到，林彪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是早已被中国人民打倒的反动势力。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党里，林彪及其死党只是一小撮，是极端孤立、极其虚弱的。他们要变天，总是要千方百计同国外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一个战士说：林彪要“借苏力量”，这正说明他所代表的国内反动阶级力量薄弱；林彪要“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这正说明广大革命人民力量强大。但是，苏修也是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林彪妄想借苏修的“核保护伞”使自己爬上“儿皇帝”的宝座，只能是白日做梦。

为了使全连对国内外阶级敌人互相勾结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性有充分认识，我们还组织大家学习了一些儒法斗争史。大家看到，历代儒法两家对待



外敌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筹集国防经费以抗匈奴，儒家则攻击为“废道德”，要废除中央经营盐铁的大权，从经济上摧毁汉朝的抗战能力。近代史上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个个尊孔读经，个个投降卖国。历来的儒家都是顽固的复辟倒退势力的代表，他们往往要同外敌相勾结，以维护其阶级利益。而民族敌人又总是看准这一点，把他们作为侵略扩张的先遣队。七班的同志在研究《盐铁论》时，把贤良、文学们鼓吹的“贵以德而贱用兵”的谬论，同林彪攻击反修斗争的谬论相比较，把贤良、文学鼓吹对匈奴赔款和亲的行为，同林彪阴谋与苏修“秘密谈判”、把中国置于苏修“核保护伞”下的罪行相对照，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尊孔反法罪恶目的之一，就是妄图为他叛国投修制造根据。从这里大家进一步认清，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我国社会上阶级敌人的活动，党内机会主义头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批判中，我们还组织全连认真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从苏修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来认清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大家列举了苏修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继承老沙皇衣钵，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的大量事实，指出：苏修叛徒集团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看作眼中钉，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卖国投修，正是适应了苏修反华的需要。林彪的下场，也充分说明了一切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行动，都是决不可能得逞的。

深入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坚定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中庸之道”是孔老二为了挽救奴隶制的崩溃，妄图阻挡奴隶造反而抛出的反动哲学，是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用以麻痹革命人民，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为了使干部战士深刻认识“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三方面对“中庸之道”进行了剖析：从哲学思想上看，所谓“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是违背“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从政治上看，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是为“复礼”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从实践上看，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完全是骗人，孔丘对奴隶起义和革新派人士的镇压是非常残酷的。三排的同志在批判中说：“中庸之道”否定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否定了人类社会在斗争中前进这一客观规律，是十足的欺人之道，复辟之道，杀人之道。我们革命战士决不能上当，一



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搞折中主义，在原则问题上不搞调和，永远站在阶级斗争和反修斗争的最前列。

弄清了“中庸之道”的反动实质，我们又组织大家深入批判林彪贩卖“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和罪行。干部战士气愤地说：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宣扬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就是要用“中庸之道”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调和阶级矛盾，麻痹革命人民，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动舆论。大家结合反修斗争的实际，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林彪用反动的“中庸之道”攻击反修斗争的罪行。大家说：林彪攻击我们同苏修的斗争“做绝了”，充分暴露了林彪是新沙皇的“超级间谍”。我们同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调和的余地。林彪妄图利用“中庸之道”，阻挡我们党领导的反修斗争的洪流，是绝对办不到的。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使干部战士进一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观点，更加坚定了将反修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极大地焕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我们党支部注意引导干部战士用这种革命精神加强连队建设，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不仅在精神上做好充分准备，也在物质上、军事技术上积极做好准备。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同志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更加自觉地苦练杀敌本领，利用巡逻、执勤等机会，开展小群练兵活动。到目前为止，每个干部战士对全连配备的多种武器，都能掌握和使用。干部战士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我们连队驻地条件比较艰苦，严冬冰天雪地，寒风透骨；盛夏炎热潮湿，蚊虫繁多。但战士们一想到为伟大祖国站岗放哨的责任，再苦心也甜，在紧张的战备工作中，人人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克服了各种困难。他们以阵地为家，在哨所周围种植树木，在密林深处开辟小块菜地。身在哨所，关心连队；离开哨所，惦记连队。有个战士在千里之外的医院治病，还多次给连队写信，关心连队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战备，充分表现了对边疆的深厚感情。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反修战备教育的最好课堂。我们全连同志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深入批林批孔，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铁打江山。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多年以来，我们连队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教导，日日夜夜、百倍警惕地坚守在祖国海防线上，每个干部、战士都以忠实履行南海哨兵的职责，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干部、战士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警惕性更高，斗志更旺盛。今年一月，我们连队参加了西沙自卫反击战，在兄弟部队和民兵、渔民的有力配合下，迅速登上甘泉岛，全歼了岛上的西贡侵略军，胜利地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集体荣立二等功。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也是我军执行保卫祖国光荣任务，做好战备工作的纲。我们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对党的基本路线理解得深，常备不懈的思想根子就扎得牢。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并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才能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懂得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有自己的军队，人民军队为什么要牢固树立战斗队的思想，才能不断提高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搞好战备，时刻准备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打仗。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林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从思想上解除我军武装，削弱我军战斗力，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因此，在部队的战备教育和战备工作中，是坚持还是反对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一直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我们结合连队实际反复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使干部、战士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根本职能，牢固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有一段时间，连队临时执行生产任务，有的同志随着任务的转换，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对战备工作有些放松。我们就引导大家联系国内外阶级斗争



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又一次反复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对照批判林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谬论,从阶级根源上去认识战争,用阶级斗争观点去看待战备问题。大家进一步懂得,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只要帝、修、反存在,我军就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连队的具体任务变了,但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不能变。有的战士说得好:“革命战士不论执行什么具体任务,心中时刻牢记我军的根本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性。”党的基本路线擦亮了同志们的眼睛,大家绷紧了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在执行生产任务的时候不忘战备,抓紧生产间隙,苦练杀敌本领,夺得了生产、战备双胜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观察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剖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本质的锐利思想武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颠覆活动,口头上却念着“和平经”,散布什么“持久和平”、“一代人的和平”等骗人鬼话。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我们发动全连同志学习毛主席有关国际形势的论述,分析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努力学会从本质上去观察问题。大家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活动的事实,看清楚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的结果就不断挑起战争。苏修搞“声东击西”,两个超级大国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天天喊“和平”,实际上天天准备发动战争。总之,只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就不会有一天安宁,决没有什么“缓和”可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拚命散布这种谎言,只是为了掩盖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进行的剧烈争夺。通过学习和分析,大家进一步认识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规律,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所惯用的手段,认清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然性,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认清丧失警惕的危险性。进而认识到,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是决不会停止的。因此,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加强,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同志们说:尽管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在不断改弦换调,但它们的侵略本性不会改变。它们越是要花招,大念“和平经”,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大家对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指示也就理解得更深刻,执行得更自觉。在每个同志的头脑里,都牢



牢树立了“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的常备不懈思想，随时准备消灭敢于入侵的敌人。今年一月十八日，我们连队的战士正分散在几个点上执勤和训练，接到上级战斗命令后，紧急集合号一响，全连干部、战士于极短的时间内齐装满员，待命出发。在较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中，很多同志不顾晕船呕吐，身体疲劳，斗志极为旺盛。当战斗发起后，一个个象下山的猛虎，冒着炮火，跳下舢板，冲向滩头，迅速全歼了甘泉岛上的西贡侵略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加强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措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人民军队首先要依靠高度的政治觉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掌握熟练的军事技术。这样，才能有效地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提高我军军事艺术，对军事训练问题，有过一系列光辉指示。在井冈山的艰苦、频繁的战斗岁月里，我军在不可能集中时间进行休整训练的情况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军事整顿和政治整顿看成同样重要，学好本领上前线。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解放以后，我军又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多次重要指示，积极开展军事训练，提高保卫祖国的本领。回顾我军几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搞好军事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林彪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我军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批林整风运动以来，我们以毛主席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为武器，结合斗争实际，深入批判林彪的反动谬论，分析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部队建设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高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苦练杀敌本领的自觉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示，从实战需要出发，加强军事训练。海南气候炎热，为了提高在酷热条件下的行军作战能力，我们全连在三伏天练习全副武装急行军，战士们戴着防毒面具在烈日下练跑步，顶风冒雨练习对海上目标射击，在各种复杂地形上练习战术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连队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西沙自卫反击战中，同志们施展了平时学到的杀敌本领，枪打得准，弹投得远，机动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勇猛、隐蔽地向敌人冲杀。共产党员、



黎族战士吕亚仁，当发现十几米外的草丛里藏着一群西贡伪军，其中有两个家伙把枪口对准他时，临危不惧，熟练地端着机枪，几个箭步冲到敌人面前，用刚学会的越南语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敌人被吕亚仁的大无畏精神和熟练的军事技术吓懵了。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十三名西贡伪军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吕亚仁同志为保卫祖国荣立了一等功。

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一向有能文能武的优良传统。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红色江山，既要百倍警惕拿枪的敌人捣乱，也要高度重视政治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风云，积极参加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向不拿枪的敌人冲击，打退修正主义的进攻。只有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胜仗，才能尽到保卫祖国的光荣职责。

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立即投入批林批孔的战斗。当时有的同志对这场伟大的斗争理解不深，对战备具体工作抓得紧，对批林批孔过问少。我们及时组织全连同志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讲述了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事实。从而使大家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打好批林批孔这一仗，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它对于每个革命战士都是十分严肃的战斗任务。同志们说：我们能打武仗，也能打文仗，批林批孔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身在西沙前线，心想国家大事，以战斗的姿态，积极投入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去。无论是在阵地上，还是在帐篷里，同志们一面紧握钢枪，一面口诛笔伐林彪、孔老二，始终保持十分高涨的革命情绪。

批林批孔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工农兵要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把林彪和孔孟之道的黑货批深批透，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全连同志在担负繁重的战备任务情况下，发扬“钉子”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有些战士文化水平低，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们说：不怕文化低，就怕不学习，不怕有困难，就怕不努力。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拿出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劲头来坚持学习和批判。岛上气温高达四十度以上，蚊虫乱飞。战士们不顾满身汗水和蚊虫咬，在马灯下读书到深



夜。有的战士为写一篇批判稿，查资料，问别人，反复钻研，直到写成方休。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回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同志们认识到，林彪搞“克己复礼”，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开历史的倒车。其阴谋如果得逞，劳动人民就要受二茬罪。革命大批判激发了干部、战士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自觉性。同志们说：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总是要搞“克己复礼”，党内也会出修正主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一定会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作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还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引导大家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认真阅读历史书籍和报刊上有关介绍儒法斗争的文章与资料，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志们认识到，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整个历史时代，儒法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分严酷、激烈的。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始皇、商鞅、李斯等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推动了社会前进。儒家的代表人物孔丘、孟轲、董仲舒之流，则从腐朽没落的阶级利益出发，极力反对革新，大搞复辟活动，妄图阻挡历史前进。大家从法家代表人物少正卯、吴起、商鞅等被杀的严酷事实中，深深地懂得，历史上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搞不好，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复辟。同时，弄清了为什么从古到今，一切没落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机会主义头子，都要尊孔反法，而新的阶级力量、革命人民和主张社会变革的代表人物，则坚持反孔尊法。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后的斗争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持久不懈地进行斗争。

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全连同志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继续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努力作战，政治上垒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军事上筑起防御帝、修、反侵略的铜墙铁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立新功。



发扬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四十七年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指引下，形成了许许多多优良的革命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继承和发扬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就能使我军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官兵一致，是毛主席为我们军队制定的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是我们军队所以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连是一九三〇年创建的一个红军连队。几十年来，我们遵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官兵一致的原则，干部和战士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各个革命时期都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连的干部、战士批判了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了林彪破坏我军官兵关系的罪行，提高了干部、战士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使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促进了连队的建设。

我们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结合、而战斗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军队的每一个指挥员，每一个战士，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兵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他们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没有人格的贵贱之分。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种官兵关系，完全是由我们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干部和战士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亲密团结，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回顾我军以至我们连在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生活非常艰苦，经常缺乏粮食和油盐，冬天还穿不上棉衣，但是由于官兵政治上、生活上平等，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大家的革命斗志却很旺盛，这对于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战斗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深深感到，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



是我们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和其它一切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提高我们军队战斗力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干部和战士之间必须互相尊重，特别是干部一定要尊重战士。这是处理好官兵关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干部更加牢固地树立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从而进一步解决了尊重战士这个根本态度问题。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向战士学习。例如，我们连炊事班有个战士，文化程度低，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够知难而进，认真攻读，刻苦钻研，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写了四十多篇批判文章，对全连批林批孔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我们连队的干部就带头向他学习。在军事训练中，很多战士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有的还有所创造，成绩突出，我们就请他们介绍经验，虚心向他们请教。就是对后进的战士，我们也教育干部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他们的积极性，学习他们的长处。这样，干部同战士在思想上、行动上就真正打成了一片。

毛主席指出：“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指明了方向。我们从连队的历史和当前的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到，实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发扬军内民主，是搞好官兵关系的重要保证。我军内部一向有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就是毛主席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民主制度。贯彻执行这些制度，无论在战时和平时，对增强我军内部团结，实行官兵一致，发挥干部和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部队战斗力，都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破坏我军的团结和统一，破坏官兵关系，也总是极力破坏我军的民主制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组织全连干部和战士对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清算了林彪一伙破坏我军民主生活的罪行，使干部、战士进一步认识到，林彪一伙的罪恶目的，就是妄



图在军队实行法西斯统治，使军队成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大家认清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从而提高了坚持我军民主制度、发扬官兵一致优良传统的自觉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制订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制度。例如，党支部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实行“开门整党”，作为一项制度，列入党的生活；加强了革命军人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每年总结工作时，要充分发动群众提意见；在军事训练中，开展评教评学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进一步活跃了连队的民主生活，密切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连队进一步做到集中统一，使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得到更好的贯彻，保证了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

部队内部发扬民主，关键在于干部要有民主作风，要能够认真听取战士的意见，诚恳接受战士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战士给干部提意见，正是爱护干部的表现。只要干部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虚心听取战士的意见，战士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自己的话都讲出来。今年二月，有三位班长一起给党支部提意见，指出党支部对军事训练抓得不够紧。党支部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吸收这三位班长参加支委会，共同研究加强军事训练的问题，还决定连干部分工深入各排，加强对军事训练的组织领导，使连队军事训练更好地开展起来。战士们感动地说：“干部这样重视我们的意见，我们要更好地关心连队建设。”批林批孔运动中，战士的积极性很高，他们抱着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连里干部和连队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于正确的意见，能立即改正的就立即改正。一时没有条件做到的，就做些解释工作，并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做到。对于少数不正确、甚至错误的意见，我们一方面教育干部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坚持做好对战士的思想工作，讲清意见错在哪里，怎样认识才对，使战士们也受到了教育。这样，就进一步增强了干部和战士之间的团结，对改进连队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干部和战士之间发生一些矛盾，这是正常现象，是不奇怪的。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就能消除隔阂，使官兵之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真正的团结。这个方法要求我们，要深入细致地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战士之间发生矛盾，一般说来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属



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如果采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往往是压而不服，反而会使矛盾激化。干部、战士的思想是会变化的，但是得有个变化的条件和过程。急于求成，不去做艰苦的、耐心的工作，当有一些矛盾一时得不到解决时，就产生急躁情绪，甚至简单粗暴，这就不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林彪胡说什么领导工作“不求做得细，做得精，就求做得快”，解决思想问题要“雷厉风行”，其实质是妄图取消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军阀主义。通过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注意了在“深入”、“细致”上下功夫。坚持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就及时做工作，不使小矛盾形成大疙瘩；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对一些较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坚持反复、耐心的做工作。这样，我们在解决干部和战士之间的矛盾方面，就感到主动得多了，效果也好得多了。有一位排长，因管理教育方法简单生硬，和排里一个战士发生了矛盾。开始，这个排长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危害性，认为自己动机是好的，就是方法不对关系也不大。后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认识，多次找那个战士谈心，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这个战士深受感动，也主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从此，两个人互相帮助，增强了革命友谊。

我们提倡做思想工作要耐心说服，反对简单粗暴，并不是说对战士的缺点错误姑息迁就，放任不管，而是要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如果对战士的缺点错误不提出批评，不帮助纠正，这是对革命不负责，对战士不关心。我们连党支部经常引导干部、战士认清耐心说服和严格要求的关系，干部都能怀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大胆管理，对战士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批评教育，做到耐心说服和严格要求相结合。实践证明，我们的战士是有觉悟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对于干部的正确批评都是会热情欢迎，对自己的缺点也是能自觉改正的。只要干部对战士的管理严得合理，严得可行，不仅不会影响团结，而且会使干部、战士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深入批判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深入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让我军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不断发扬光大，使连队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胜利前进。



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找油找气

中国共产党大港油田委员会

为了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们这支石油勘探队伍，一九六四年从大庆挥师南下，来到大港地区找油找气。

这里是一个断陷盆地^①，在勘探中遇到了我们未曾经历过的非常复杂的地质情况，以及油气运移聚集的许多特殊规律。如何认识断陷盆地找油找气的特点，为祖国找到更多的油气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十年来，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继承和发扬大庆的光荣传统，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断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逐步摸索出一些断陷盆地油气运移聚集的规律，为祖国找到了新的油气田。油田面积不断扩大，原油产量逐年大幅度增长，找油找气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实践证明：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指导石油勘探工作的锐利武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抓住主要矛盾，沿着主断层找高产区

勘探开始时，为了尽快地找到油气田，我们着眼整个盆地，在各个不同的构造部位上，打了五排深探井，进行了整体解剖。经过一年的努力，有一口井喜喷了原油。接着，我们在这口井所在的储油构造上，布置了一批探井，想把含油面



积一下子搞清楚，一举拿下这个油田。然而，钻探的初步结果表明，地下的地质情况十分复杂。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断层^②，把地层切割得支离破碎。在钻井过程中，常常因钻遇断层而断缺了含油层，而且出现了油层忽有忽无、忽厚忽薄、忽油忽水，原油忽稠忽稀，产量忽高忽低的“五忽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同志思想上产生了“怕”字，见到断层躲着走，钻遇断层就发愁。有的甚至认为：这里地质情况复杂多变，“不仅象一个打碎的瓷盘子，而且又踢了一脚”，无规可循，没法认识，把复杂的断裂地带视为勘探的“禁区”。

究竟复杂的断裂带是有规可循还是无规可循？是可以认识还是没法认识？这是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毛主席指出：“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实践论》）这就告诉我们，一切客观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都是可以逐步认识的。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确实象个打碎了的瓷盘子，比较复杂，但不存在被什么神秘的力量“踢了一脚”。所谓“踢了一脚”的说法，既否定了油气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也否定了人们认识它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尚未探索的新领域，绝没有永远不可认识的“禁区”，关键问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只要认识路线搞正确了，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对于复杂的地质情况，就可以由不知转变为知、由知之不多转变为知之较多，在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中，逐步获得自由，取得勘探工作的主动权。有的同志说得好：“断层复杂不可怕，就怕缺少唯物辩证法。”

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决心通过实践掌握断陷盆地油气富集高产的规律。我们选择了一个断层比较多的复杂地带作为突破口，反复地做地震细测工作，增加一些必要的探井，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这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油气的分布和断层有密切的关系，油田出现“五忽”现象，主要是断层造成的。因此，要掌握断陷盆地油气分布的规律，认识油田出现的“五忽”现象，就必须认识断层的特性，以及对油气运移聚集的作用。

但是，断层有大有小，不同的断层对油气分布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断层对油气的运移聚集起主导作用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过程



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我们决心在实践中抓住主要矛盾，求得问题的解决。

在某一个构造带的勘探过程中^③，第一口井打在靠近主断层具有圈闭条件的高部位^④，获得了高产，接着在附近打了两口井，也出了油；后来由主断层两侧向外扩张打井，结果是离主断层越远，产量越低。这虽然只是一种现象，但“现象是本质的显现”，（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透过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油气分布是和主断层息息相关的。我们回过头来对另一个地区已打过的探井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的高产井都分布在靠近主断层的两侧，再一次说明，主断层是影响油气运移聚集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个认识是否正确，不能凭主观上的感觉而定，而要依据客观上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于是我们在又一个构造带的主断层两侧的圈闭内布了一批井，靠着主断层打，结果打出的井百分之六十是高产油气井。实践证实了主断层控制着油气的运移与聚集，是形成油气富集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就能找到高产。

原来，主断层多分布在构造带的脊部或其一侧，由于主断层的多次活动，在主断层一侧或两侧形成储油层厚，储集油气的圈闭类型多，又是相对的高部位，使得地下分散的油气在主断层两侧或一侧富集起来。这样，我们只要在主断层一侧或两侧圈闭好的地方打井，就可以获得高产。

事实说明，断层的作用也有两重性，它既有造成油田复杂的一面，又有形成油气富集的一面。根据主断层控制油气运移聚集的规律，我们采取沿着主断层找圈闭、打高点、夺高产的办法，找到了一批高产区、高产块，打出了一批高产井，使多年不敢勘探的“禁区”变成了高产区，似乎神秘莫测的“五忽”现象也开始被我们所掌握，大大推动了勘探工作的进展。

运用矛盾转化规律，在秃顶构造上找到油

勘探石油，一般要寻找具有生油层、储集层、盖油层等组合条件的圈闭构造。



在我们探区，广泛分布着缺失生油层的秃顶构造。应该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勘探对象？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在勘探初期的“战略侦察”阶段，我们曾在一个秃顶构造上打过两口井，但没有发现油气显示，再加上它本身缺失生油层，因此，我们就没有把秃顶构造作为一个重要的勘探对象。

然而，实践总是不断地提出许多新问题，启发人们的思考。在某构造对深部原生油藏的钻探过程中^⑤，发现深部的原生油藏已遭到破坏，而在上部缺乏生油条件的浅层，却发现了油气藏。浅层不具备生油条件，为什么会含油呢？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原来是深部原生油藏的油气经过开启断层运移到浅层圈闭，从而形成了浅层次生油气藏^⑥。这个新的发现，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既然在断陷盆地，由于断层的作用没有生油条件的浅层可以由不含油转化为含油，那么，与此类似的秃顶构造是否也可能出现这种转化呢？这个问题一提出，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争论首先集中在我们曾经勘探过的某秃顶构造上。有的同志认为，秃顶构造和已找到的浅层次生油藏的情况不同，它缺失生油层，深部没有原生油藏，过去又在它上边打过两口干井，因此它不可能含油。但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根据已经获得的经验教训，认为应该立足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矛盾论》）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这个秃顶构造虽然缺失了生油层，深部没有原生油藏，但它是一个长期发育的隆起，周围被生油凹陷所环抱，离油源较近；而且后期断层比较发育，有的直接延伸到周围的生油凹陷，这就使得油气有可能沿断层等通道向秃顶构造运移聚集，在浅层形成次生油气藏，由原来的不含油转变为含油。因此，在它上面找油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于是我们决定第二次上秃顶构造找油。

上去以后，由于我们对秃顶构造含油的特点缺乏认识，第一口井落空了。这时，有些人又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灰心，坐下来冷静地分析了原因。发现这口井和过去两口井一样，都打在次生油藏形成不利的地方。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又重新安排了井位，终于打出了油。接着，我们在其他一些秃顶构造上，也相继发现了油田，大大扩展了在断陷盆地找油找气的领域。现在，秃



顶构造上的油田占我区油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而且一般油气层埋藏浅,钻井周期短,见效快,这对多快好省地发展石油工业有着重要意义。

实践说明,在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中,秃顶构造不含油并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只看到秃顶构造缺失生油层,而看不到周围生油凹陷的油气,可以通过断层等通道向它运移聚集;只看到一两口井没有打出油来,而看不到其他地方具有含油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世界上的事物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我们应该从发展、联系和转化上把握事物,而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只有尊重事物本来的辩证法,才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从局部经验上升到一般,认识储油岩类的多样性

我们这个地区的油田,不仅从含油层系上看是深浅不一的,就储油岩类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是断陷盆地油气储集分布与其他类型的盆地不同的又一个特点。

由于我们过去主要是在砂岩储油层中找到油气,多年与砂岩打交道,慢慢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了“只知找砂岩”的框框。来到这个探区以后,也是搞单打一,“找到砂岩喜心头,找不到砂岩皱眉头”。这种“只知找砂岩”的经验主义,象一堵墙一样把我们的主观和客观隔离开来,使我们认识不到这个地区储油岩类的多样性,特别是对生物灰岩这个有利的储油层的认识,走了一段弯路。

在勘探过程中,我们接连在几口探井中发现了生物灰岩,由于“只知找砂岩”的框框的束缚,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又在一口井中发现了生物灰岩,而且见到油气显示,却又根据油质重,把它看成是氧化破坏作用的产物,含油价值不大,没有下套管试油。直到在某井取出了含油饱满的生物灰岩岩心,才下套管试油,结果获得了高产油气流,喷高达几十米,开始破了我们头脑中“只知找砂岩”的框框,认识到生物灰岩在我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储油岩类。

然而,人们对一个新事物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经验主义的屏障也不是一下就能搬掉的,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的发展过程。认识了生物灰岩是一个重要的储油岩类,但是生物灰岩的储油性能怎样呢?当时还不十分清楚。接着,在钻井过程中遇到许多薄层含油生物灰岩,有



些同志仍然套用以往薄层砂岩一般出油不多的框框，没有试油。后来在某井钻探中，全井只找到两个一米厚的薄层含油生物灰岩，要不要试油？争论很激烈。有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生物灰岩和砂岩性质不同的特点，主张试油，结果获得了大量的油气流。实践证明，生物灰岩储油层连通性好，经过酸化处理后，油气产量成倍增加，是一个重要的勘探对象。

生物灰岩储油层的发现，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找砂岩的局部经验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列宁指出：“**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实践中，我们有了找砂岩储油层的经验，这是可贵的，其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各种储油岩类的一般性能提供了感性知识。然而，找砂岩的经验又是有限性的，还必须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什么岩类能够储油，不在于它是砂岩还是生物灰岩，也不在于是沉积岩还是火成岩，而在于它们有无储存油气的孔隙和裂缝。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同时又有油源和油气聚集保存的其他条件，任何岩类都可以储油。断陷盆地由于断裂的多次活动，使得盆地出现多凸多凹，形成多个沉积凹陷，各凹陷沉积环境不同，物源不一，因而能够发育多种不同类型的储油岩类。如果“只知找砂岩”，把找砂岩储油层的经验绝对化，那就不用个别代替了一般，堵塞了我们对断陷盆地储油岩类多样性的认识，使我们不能积极发现新事物，认真研究新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由于我们对断陷盆地储油岩类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克服了“只知找砂岩”的经验主义，这就使我们比较自觉地去寻找各种不同的储油岩类，深入研究尚未认识的领域，很快就在白云质灰岩、泥灰岩、具有裂缝的泥岩以及玄武岩中找到了油气，使我区储油岩类由两种扩大到六种，打开了向多种储油岩类找油找气的广阔道路。一些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搞勘探，只知找砂岩，回头看一看，丢了一大片，不克服经验主义，真是有油也找不到啊！”

着眼全体看部分，实现块块油田连片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我们先后拿下了几个油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已有的几个油田，都是一块一块的油田，分布在地下统一的构造带的几个高点上，彼此间被低洼部位即鞍部所隔开。有的同志根据背斜构造油田的理论^①，认为



现有的油田，油水界面已经探明，油水界面以下的低部位是水，不可能含油，所以，我们的油田已经定型，要想再扩大、连片没有希望了。究竟现有的几个块块油田能不能再扩大、连片？这需要我们在继续实践中加以研究解决。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对现有的油田从总体上进行分析，发现我们找到的几个油田的储量，与根据各种方法预算的储量相差很大，这说明地下还有很多油气没有为我们所掌握，油田定型的说法，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事物的全体与部分是对立的统一，全体总是由部分组成的，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立足于全体去认识部分，才能对各断块油田能否连片做出正确的判断。

经过对几年来所掌握的地质情况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各断块油田具有连片的可能性。从局部看，各断块彼此间差异很大，似乎是互不相干的；但从全体上看，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都分布在一个被生油凹陷所环抱、油源十分丰富的统一构造带上，有着共同的发育历史和形成油气藏的条件。因此，各断块都存在着含油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块块油田能够连片组成大油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在把几个油田隔开的各个低洼的鞍部找到新的油气层，发现新的油田。一个断块油田的勘探结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这个油田探边过程中，发现原来的含油层已经不含油了，但在它的油水界面以下，却找到了新的含油层。接着，我们在几个油田之间的鞍部和倾没部位布井，也相继找到了新的含油层，而且有的地方还找到了原来的含油层，终于使彼此分隔的块块油田，扩大连片组成为大油田。为什么低洼的鞍部也有油气藏呢？这是因为断裂的多次活动，使得油气多次运移聚集，开启性断层具有通道作用，往往使油气搬家到上覆地层，封闭性断层总是把油气遮挡在原来的地方，从而形成多套含油层系，多种油藏类型，各套油层的分布，在有的部位呈“楼房式”，有的部位则象屋顶上的“叠瓦”，等等，高部位和低部位都有油气层，投影在地面上表现为一个连片成带的大油田。

事实告诉我们，断陷盆地连片成带的大油田，既具有一般大油田共有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以一个大面积的被生油凹陷所环抱或面临生油凹陷的统一构造带为基础的，这是普遍性；但它是一个由不同的油气层系、不同的油藏类型、不同的油水界面的断块油田连片组成的。在同一断块内，由于有统一



的油气层和统一的油水界面，油水界面以上是油气，以下是水是肯定的，但不同断块之间，含油气的层位和油水界面各不相同。因此，不能套用背斜构造油田的框框，判定高部位是油气，低部位是水，这是它的特殊性。只有掌握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才能对断陷盆地的油田连片，作出正确的判断。只看到特殊性，忽视普遍性，不着眼全体看部分，就会否定断块油田连片的可能性；只看到普遍性，忽视特殊性，不了解组成全体的各个断块的具体特性，也不能取得断块油田如何连片的正确认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制定了着眼整个构造带，立足于多层系找油找气，从多种油气藏类型入手，整体部署，整体解剖的勘探原则，大大加快了油田的勘探步伐，使我们的勘探工作，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恩格斯指出：“**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反杜林论》）总结十年来的勘探历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折的，螺旋式上升的。在石油勘探中，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还是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是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进行石油勘探工作的大问题。油气在地层内部的运动十分复杂，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有着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沿着正确的认识路线，唯物而又辩证地对待它们，才能分清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全体，什么是局部，正确地把握油气运动的规律，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加快油田勘探的步伐。我们决心在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大鼓干劲，多找油气，为迅速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而努力。

注：

- | | |
|---|---|
| <p>① 断陷盆地：由于断裂活动，使地壳下陷而形成的沉积盆地。</p> <p>② 断层：岩层受力发生破裂后，沿破裂面发生显著位移和错开的地质现象。</p> <p>③⑦ 构造带、背斜构造：由于地壳运动，使岩层形成“馒头状”的隆起叫背斜构造。由许多背斜构造组成的条带状隆起叫构造</p> | <p>带。</p> <p>④ 圈闭：在储油层中能够聚集和保存油气的天然“容器”。</p> <p>⑤ 原生油藏：油气直接从生油层中运移到储油层，聚集起来形成的油藏。</p> <p>⑥ 次生油藏：原生油藏的油气遭到破坏，第二次运移聚集形成的油藏。</p> |
|---|---|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订草案)

(一九七三年九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六月修订)

编者说明：本刊转载上海市嘉定县新泾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可供各地农村干部、群众阅读、参考。这种规划的用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个大队的群众反映：有规划和没有规划大不一样。有一个鼓舞人心而又切合实际的远景规划，就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就有利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就能激发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积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制订出来的规划，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新泾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为着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制订了这个七年规划。

解放以后，我们贫下中农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生产节节高，生活年年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提出的“千斤粮，百斤棉”，“河里蓬蓬蓬（抽水机），田里冒烟囱（拖拉机）”等奋斗目标，现在已经变成现实。我们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提高。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把新泾大队建成一个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作出这个一九七四——一九八〇年发展农业的七年规划，加上每一年的实施计划，可以使大家明确奋斗目标，知道七年中间要干些什么？干到啥样子？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上一步时要为下一步准备些什么？干劲往哪里使？力量该怎样组织？使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努力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各项指标。

毛主席指出：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我们大队全体干部和社员，决心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规划而努力奋斗！

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大队一级的作用，领导和帮助各生产队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干部要和贫下中农心连心，年年都要实行开门整风，做到干部群众鱼水亲，社员当家作主人。特别要使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遇到大风大浪脚跟稳，遇到妖风毒雾不迷航，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胜利前进。

二、争取粮、棉、油产量达到“二、二、三”。即到一九八〇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三百七十斤增加百分之四十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七十四万斤（平均每人超过一千斤）；皮棉平均亩产达到二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二斤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油菜籽平均亩产达到三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九十八斤增加二倍以上。

三、发展以猪为首的多种经营。到一九八〇年，大队、生产队、社员的生猪饲养量达到四千五百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卖给国家肉猪二千三百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全大队七个水塘变鱼塘，养鱼八千尾。利用畜牧场空地，种果树二千株，葡萄一千五百株。培育蚌珍珠四十斤。种植蘑菇二万平方尺。积极发展养鸡养鸭。一九八〇年副业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变新泾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乡，向国家提供更多的农副产品。



四、实现“四旁”绿化。从一九七四年起，每年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种树三千株和一批杞柳。一九八〇年，实现“村前宅后种香樟，白榆水杉栽路旁，杞柳种在沟边上，条条大路树成行”。

五、建造高产稳产田。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有计划地改造河道，调整水渠，完成新泾、陆泾、横泾、长浜等十一条河浜的填没、疏通、截弯、接通等项水利工程，总共挖（填）土方二十万方。开新河，填老河，增加耕地面积三十亩。

将现有灌溉渠道改成暗渠，埋设地下干渠、支渠一万七千米，其中“平战两用渠”五百米，每个生产队有五十米左右。将现有两个灌区调整为三个灌区，增设一只机口，田间开好垅沟、腰沟、围沟、大明沟四级排水沟。做到沟渠配套，排灌分开，自立门户，互不干扰。

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将全大队一千八百多块大小不等的田块，因地制宜，分别建成面积为二亩、二亩四、二亩五三种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一千三百多块（到今春已建成四百多块）。并逐步调整插花田，平整高亢地，以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

七、增积自然肥料。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养猪积肥，种好绿肥，常年沤肥，建立一个机动船队，到上海市区装运杂肥。增加有机质肥料使用量，改良土壤，达到每亩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质肥料。

八、大队建立种子基地，生产队建立种子田，培育良种。种子以自选、自繁、自留、自用为主，以调进为辅，重点搞好粮食三熟制高产品种配套，并力争在四、五年内，培育出一两个稳产高产的早稻品种；同时，还要搞好其他品种的稻种提纯复壮，逐步实现良种化。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力争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和控制水稻的螟虫和纹枯病，三麦的粘虫和赤霉病，棉花的红蜘蛛、红铃虫和立枯病等病虫害。大队坚持多点测报，生产队落实“二查二定”防治措施（查病虫发育进度，定防治时间；查病虫发生量，定防治田块）。在一九七四年内做到每五十亩田有一盏高压电网杀虫灯，逐步做到队队建立农药专仓，确保治早、治小、治了，稳、准、狠地消灭病虫害，做到农业产量增上去，用药成本降下来。

十、大队建立“科学种田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一组（科学种田小组）四员（种子员、植保员、栽培员、管水员）”。大队和生产队都要种好试验田，摸索增产规律。定期向社员上农业技术课。组织青年社员学种田，练好农业生产基本功，逐



步扩大土生土长的农业技术队伍。

十一、进一步提高机械化程度，重点解决拔秧、插秧、收割、耘稻“四弯腰”。到一九八〇年，十一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有十样机：小型拖拉机、小挂机、拔秧机、插秧机、收割机、耘稻机、开沟机、中耕机、喷雾机、脱粒清扬机等。做到既减轻社员劳动强度，加快生产进度，又做到“季节质量有保证，精耕细作产量增”。

十二、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新筑一条二千六百米长的农机干道贯穿南北，十五条农机通道横贯东西，大小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路上跑农机，路下埋灌渠，便利交通，节省土地。

十三、发展大队集体经济。在今后七年内，进一步办好队办工厂，增加积累，促进农田基本建设。除现有的镜片加工厂、农机修理组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外，争取再办一个小工厂，承担为大工业服务的零配件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组织多余劳动力办好大队副业。到一九八〇年，大队一级经济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三年的二万元提高到十五万元。

十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员收入。到一九八〇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每人一百七十六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

十五、逐年增加粮食储备。到一九八〇年，全大队确保储备粮食一百二十万斤，足够全体社员吃一年半。经常向社员进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教育，提倡家家户户储备粮食。

十六、办好大队商业。到一九七五年，在大队所在地——新村，开设一个综合性的代销店，进一步办好现有的“五匠组”（泥、竹、木、理发、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十七、逐步改造旧宅基，建立新村庄。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社员家庭住房。

十八、普及中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过去，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一部分贫下中农受不到教育。我们大队目前还有成年文盲一百九十五个。以政治夜校为阵地，采取一教一，一帮一，平时不放松，冬季集中抓的办法，到一九七六年，全部扫除青壮年社员中的文盲。今后新农民普遍达到中学文化水平。

十九、除害灭病，提高社员健康水平。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良好习惯，队队达到“卫生村”水平。普及卫生知识，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家家饮用井水，全大队三百七十四户，平均二户半有一口井。户户粪便入池，全大队三十七只化粪池，都要



提高发酵沉卵水平。坚持反复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加强粪水管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血防成果，不断降低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二十、进一步搞好合作医疗，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的队伍。充分发挥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作用，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勤俭办合作医疗。队队建立卫生室，大队办好卫生所，设立简易病床，逐步减少收费标准，扩大报销范围。到一九八〇年，每人每年交纳合作医疗基金从现在的二元减到一元，报销金额从现在的三十元扩大到六十元。

二十一、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队队办好农忙托儿所，分片办好幼儿园，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假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二、活跃社员业余文体生活。到一九八〇年，逐步实现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文化室，一架电视机，一个篮球场（利用仓库场地）；大队有业余文艺队、体育队、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在内）。

二十三、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进一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继续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今后的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千分之十左右。

二十四、培养贫下中农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到一九八〇年，每个生产队形成一支五至十人左右不脱产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四旧”。

二十五、加强大队民兵连建设。根据“劳武结合”的原则，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集体经济，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胆敢入侵之敌。

二十六、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天数，全年不少于一百二十天。生产队干部要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二十七、对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春节前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以利再战。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学大寨 讲路线

——湖北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的调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七〇年以来，这个大队跨了四大步，粮食生产连续四年超《纲要》，总产每年递增四十多万斤。一九七三年亩产达到一千五百多斤，总产比一九六九年将近翻了一番。多种经营也有较大发展，棉花、生猪也连续三年超《纲要》。对国家的贡献、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一九七三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百零三万斤，集体储备粮三十二万斤，公共积累五十五万元，社员每人平均纯收入一百一十五元。这个大队的变化又一次生动地说明，学大寨必须讲路线，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方向明，干劲大，继续革命永向前。

以前，这个大队也讲学大寨，但是，由于没有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领导班子内部思想不统一，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有坚决斗争，对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坚决批判，因而方向不明，决心不大，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能迅速开展。一九七〇年，《人民日报》在《农业学大寨》的社论中提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八一大队党支部深受震动。他们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社论和有关文件，揭矛盾，找差距，分析学大寨没有学好的原因。一学一找，触动不小。比大寨，比昔阳，差就差在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不抓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纲，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和群众，不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就不可能使农业生产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学大寨的运动就不能迅速展开。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大队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结合实际，揭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全大队干部、社员广泛开展三忆三比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比新社会的甜；忆单干时的苦，比走集体化道路的甜；忆受修正主义路线的苦，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进一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贫下中农说：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胜利线、幸福线；回头路走不得，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胡同。干部、群众纷纷投入革命大批判的战斗中去，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一小撮破坏农业学大寨、妄图变天复辟的阶级敌人，批评走回头路的资本主义倾向，激发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年冬季，八一大队兴修了一座蓄水十二万方的水库，扩大水田面积三百多亩。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连续两年粮食总产递增五十多万斤。大家说：“路线对了，人心顺了，步调一致了，学大寨就上路了。”

学大寨讲路线，要认真总结“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一九七二年，八一大队双季稻面积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亩。这年，遇上百日大旱，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天大旱，人大干，全大队十三个生产队有十二个增了产，可是有一个生产队减了产。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开始有人认为是这个生产队插秧季节没抢住、生产技术不过硬。可是后来一查，发现有一个劳改释放犯在自然灾害面前散布“天命论”，鼓吹减产定局，煽动搞副业捞钱，胡说什么，见钱不抓是傻瓜。在敌人煽动下，队上有八部板车在“双抢”大忙季节，轮流外出拉车赚钱，结果误了季节，影响了农业生产。这个事实说明，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前进、要革命，阶级敌人可不死心，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各个领域向我们进攻，搞破坏，妄图开倒车。这种斗争也会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人民内部也会有思想斗争。比如，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听得进；有人看见敌人破坏生产却认为是技术问题而不过问；有人看不见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有人有懦夫懒汉思想，在自然灾害面前听天由命等等。这些情况，不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解决是不行的。要大干社会主义，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得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什么时候就会走上邪路。

有的人一讲生产，就忘了路线，忘了阶级斗争，一提起治岗改田、改革耕作



制度，就只见到劳力、工具、土石方进度、面积、季节等等，而不注意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教育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这是不对的。八一大队党支部的同志说得好：“搞生产，要大干；大干，就得靠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他们还坚持把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到生产过程，**细致、具体地去做**，经常组织群众在田边地头反复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在革命大批判中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自觉地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形势，辨别风向，分析问题，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就能团结战斗，步伐一致，胜利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一九七二年冬到一九七三年春，八一大队党支部又带领群众改土造田二百七十九亩，修水平梯田二百多亩，开挖排灌渠道二十二条，长七千多米、共完成十多万土石方。一九七三年，这个大队双季稻扩大到一千八百六十亩，有五个生产队早稻一季上了《纲要》，一九七二年减产的那个生产队，早稻一季过了千斤。社员们说：党的基本路线指引我们大干大增产，大灾也增产。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八一大队在连续四年获得农业丰收的一九七三年，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快学大寨步伐时，有的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说什么这几年批也批了，斗也斗了，人也变了，田也改了，路线教育再抓成了老一套，主张抓几项关键性的技术措施。

斗争赢得了胜利，胜利后要不要继续革命，成为八一大队党支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新课题。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伟大教导，引导干部、群众回顾八一大队在学大寨过程中和修正主义路线斗，和阶级敌人散布的“天命论”斗，和因循守旧、懦夫懒汉思想斗，改天换地赢得四年四大步的战斗历程，从中吸取经验。大家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经常讲，反复讲，好象是老一套，实际上，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不断发展的，每个斗争回合都有新的内容，只要我们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每经过一次实践，对党的基本路线都会有进一步的理解，每经过一次斗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就会更提高一步。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积极投入战斗，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大家联系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又揭发出八一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孔孟之道毒害青年，破坏农业学大寨，妄图复辟变天的新的罪行，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林彪及其代表的反动阶级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叫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吃二遍苦。我们反复辟，反倒退，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一直斗到共产主义。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为了把批林批孔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大队党支部领导干部、群众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理论联系实际，又掀起了一个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的热潮。他们以政治夜校为阵地，把批林批孔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还举办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展览，办小评论专栏，用土广播、黑板报等宣传阵地，使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经常化、具体化，引导干部、群众遇事划路线，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比如：“是前进还是倒退？”“是为集体还是为私有？”“对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反对？”“是反潮流还是和为贵？”等等，发动干部和群众反复讨论，在学习时结合批判、在批判时坚持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

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发展，八一大队农业学大寨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全大队二千九百六十九亩耕地有百分之八十实现了旱涝保收，双季稻面积从一九六九年的一百一十多亩发展到二千多亩，三分之一的面积实行了三熟制。今年，夏收作物和早稻的产量比去年都有增加，中稻和棉花比过去任何一年长势都好。更可喜的是，全大队出现了一个对修正主义路线有人斗、对资本主义邪气有人顶、对错误倾向有人批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随县委员会宣传部调查组



路线搞对头 生产争上游

——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的调查报告

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使车站的干部和工人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运输生产取得很大成绩。一九七三年提前十一天超额完成全年运输生产任务，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货物发送吨增长一点七倍，装车数提高一点五倍，卸车数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货车平均停留时间压缩了百分之十，日平均待卸车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三点六，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搞好铁路运输和搞好其他各项革命工作一样，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头，工作吃苦头；路线搞对头，生产争上游”，这是桂林北站的干部和工人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体会。铁路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怎样才能当好先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在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逐步提高、不断加深的。

桂林北站是湘桂线上的一个区段站，担负着二十个县、两个市的物资转运任务，同时还负责向二十多个车站排送空车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到达这个站的物资急剧增长，卸车工作量不断增加，是一个卸大于装的车站。根据这个站的特点，本来更应该贯彻“一卸、二排、三装”的运输原则，抓住卸车这个主要环节，才能取得运输生产的主动权。但是，有一段时间，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的干部认为“装是硬指标，卸是软任务”，重装轻卸，主次倒置，造成待卸的货车积压，货场堵塞，事故多，效率低，“先行官”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这个站曾经多次采取了停装、限装和突击卸车、搬运“大会战”等办法，希望缓和一下矛盾。但是，这些做法，都没有解决问题，货场堵塞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事实证明，要搞好铁路运输生产，必须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搞对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从路线上解决问题，正确的运输原则就不能得到落实。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桂林



北站通过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揭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铁路运输上的表现和影响，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使车站的经营方向得到端正，于是被动很快地变成了主动，落后变成了先进。

几年来，桂林北站在解决运量大于运能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路内路外一盘棋，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贯彻“一卸、二排、三装”的运输原则，大挖运输潜力，努力当好先行，初步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指标挂帅”，正确处理站内运转、货运、装卸各车间的关系。“一卸、二排、三装”的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整体利益和铁路运输生产高度集中统一、作业连续性的要求。卸、排、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卸车是为了装车；卸好车，才能把空车排出去，保证重点物资的运输。坚持这个原则，才能更好地完成运输任务，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保证国防建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执行这个原则，要求各部门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和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各车间围绕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大目标，拧成一股绳。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去单纯地考虑指标、搞“指标挂帅”，就会助长本位主义，妨碍各车间的团结。比如运转车间担负着运输组织的任务，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运老大”思想，就会片面地认为安全、正点重要，少装卸几车关系不大，该取送的车不及时取送，使装卸车间不能均衡作业，造成人为窝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站的运转车间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谬论，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识到运转车间如果不同货运、装卸车间密切协作，认真执行“一卸、二排、三装”的原则，车卸不下，空车排不出，货装不上，不仅行车安全、正点没有可靠的保证，而且会影响整个运输的全局。于是他们主动提出“为革命，我们宁可千辛万苦，决不使装卸、货运一时为难”的口号，处处抢困难，让方便。除了在取送车作业做到均衡、及时、对准装卸货物位置之外，还在交班之前必定送一批作业车到装卸货物位置上，保证装卸人员一接班就有活干。工人把这叫作“必保活”。装卸、货运车间的工人称赞这种“必保活”，体现了群众的愿望和革命的利益，保证了运输任务的完成，提高了运输效率。这个站今年上半年向邻局、邻站排送空车的计划兑现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去年同期比较，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二。这说明要执行“一卸、二排、三装”的原则，不是光靠哪个车间的努力可以办到的，需要车站各个车间的密切配



合才能奏效；也不是简单地规定一些协作的制度就行得通的，而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解决问题。

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努力做好长短途运输衔接工作，加速货位周转。卸车首先要有卸货的位置。货位充裕，才能随到随卸。但是货位究竟是有限的，而货物到站则是源源不断的。要使有限的货位适应源源不断到站的货物卸车的需要，就要把已经卸下的货物迅速搬运出站，腾出货位，加速货位的周转。由于货运量大增，地方短途搬运力一时跟不上，车站卸下的货物往往不能及时搬运出站，货位周转不灵，造成卸车困难。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使桂林北站的干部和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提高。他们认识到，长途运输和短途搬运，是一个统一的运输整体，短途搬运要保证长途运输，长途运输要为短途搬运创造条件，使长短途运输密切衔接，互相配合，才能提高运输效率。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这个站同有关部门一起，对桂林市的短途搬运情况，作了多次调查研究，提出以下几个解决办法：第一，发挥收货单位自有车的作用，增强短途搬运能力。第二，就近卸车，减少市内短途搬运的压力。凡是能够就近卸车的，车站就主动把货车送到靠近收货单位的货场和专用线卸车。第三，卸照顾搬，为搬运提高效率创造条件。站内装卸车的规章制度要为短途搬运提供方便。第四，实行大宗散装货物归大堆的办法，变分散的收货单位为一个统一的收货单位，使一个货位顶十几个货位。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桂林北站的货位周转时间，逐年缩短，一九七三年比一九七二年缩短百分之四十，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又缩短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做到了货场畅通，卸车迅速。实践证明，正确处理长短途运输的关系，就是要充分发挥车站、搬运和收货单位三个方面的长处，发扬共产主义协作风格，挖掘运输潜力，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才能较好地解决货运量大于搬运力的矛盾。

克服“铁老大”思想，加强同专用线企业的协作，提高专用线的卸车能力。桂林北站专用线的卸车量占全站百分之六十以上，抓好专用线的管理很重要。有一段时间，车站有的同志认为“车站是行车的组织者，专用线得听我们的”。在运输业务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老来自居，想卡人家。而专用线企业有的同志也认为“专用线是我们的，装卸快慢，车站管不着”。一个想“卡人家”，一个说“管不着”，思想上闹别扭，工作不主动。结果是经常发生车辆送不进，取不出，卸不下，大量的车在专用线里睡大觉，造成严重压车的现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大讲全国的大好形势，大讲加快卸车速度，加速车辆周转与支援工农业生产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密切关系，把卸车工作提到路线高



度来认识。这就使广大干部和工人的思想境界冲破了本位主义思想的束缚，扩大了视野，认识到社会主义铁路的运输营业线也好，企业的专用线也好，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都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从铁路来说，铁路运输是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车站的规章制度和铁路干部、工人的思想、作风和态度处处要体现“人民铁路为人民”，不能有半点“铁老大”思想。同时，铁路运输又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具有昼夜运输不停，车辆使用高度统一调度的特点，专用线的厂矿企业又必须适应铁路运输的需要，为铁路畅通无阻大开绿灯。

为了加强同专用线企业的协作，桂林北站的领导人员，经常到专用线企业登门拜访，虚心听取意见，热情宣传铁路运输的特点，互通情报，加强团结，并在制度上破除一些不利于协作的陈规旧例，立有利于协作的新制新风。车站改进了作风，卸车工作得到了专用线企业的大力支持，做到随到随卸。专用线待卸车数在一九七一年占全站待卸车的百分之七十，现在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桂林北站和物资部门搞好协作的事例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企业之间是兄弟企业的关系，只能互相支持，不能互相拆台，更不能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

依靠群众搞技术革新，发挥装卸机器的效能，加快卸车速度。近年来，上级给这个站配备了一些蒸汽吊机、龙门吊机、叉式车等装卸机器，为提高装卸效率创造了条件。但是，过去这些机器只能装卸大型笨重的货物，不能一机多用。有的同志认为这些机器作用不大，碍手碍脚，弄不好还容易发生装卸事故。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中，工人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教导，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现有的装卸机器进行改革。他们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在蒸汽吊机上安装了抓斗，在龙门吊机上配备了砖夹、纸夹、袋夹，使它既可装卸大型笨重的货物，又可以装卸散装货物。近年来，这个站依靠广大工人大搞技术革新，先后改革装卸机械设备十四项共一百七十七件，使机械作业比重迅速提高。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一点一倍，装卸工人减少了七十多名，装卸总工作量提高了百分之五点一。

桂林北站的干部和工人们说，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是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推动起来的。他们表示要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列车通行无阻，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柳州铁路局党委会 联合调查组
柳州铁路分局党委会

